

從《民俗臺灣》看柳田國男對
臺灣民俗研究的建構與可能

王婷儀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無形文化資產組碩士

摘要

臺灣民俗研究從日治至今一直寄居在人類學、文學、史學等學科下，學界對民俗研究為何無法成為一門學科等問題鮮少關注。本文為探究此議題，選擇戰前曾一度訪臺的日本民俗學之父柳田國男為研究焦點，以《民俗臺灣》為例，思索臺灣民俗學建構的可能。首先運用第一手史料文獻、研究專書及戰前報刊，解析柳田國男在臺的人脈關係和訪臺旅行。再者，透過雜誌《民俗臺灣》刊登的民俗相關文章，檢視臺灣民俗研究如何受柳田國男民俗學方法論的影響。本文最後著眼於柳田的民俗學概念如何透過《民俗臺灣》的編輯工作具體在臺灣實踐。《民俗臺灣》雜誌開闢了漢人民俗交流討論的園地，同時逐步建構臺灣民俗學成形的基本要件。太平洋戰爭期間，臺灣民俗研究逐漸展開。臺北帝大教授金關丈夫的廣大學術人脈、金關及日本民俗學界的往來、還有素人民俗研究者的熱心參與奠定了臺灣民俗研究蓬勃發展的主要基礎。《民俗臺灣》中眾多篇章對「民俗學」的研究方法、學科觀點等議題進行討論，也直接反映出當時把民俗學視為一門學科的初步關心。才促進了《民俗臺灣》中眾多篇章對「民俗學」的研究方法、學科觀點等議題討論漸增。本文以當時儼然發展成熟的柳田國男民俗學方法論作為主要骨幹，逐步梳理《民俗臺灣》中可見的柳田影響。內容包含：「編輯對民俗的理解」、「民俗紀錄書寫的原則」、「柳田國男書籍的介紹與評論文章」、「柳田國男書籍的全版廣告」、「古稀談話會」、大量的「雜誌《民間傳承》內容介紹」、「柳田文章的引用」、「民俗臺灣同仁對方法論的實際操作」與「柳田投稿於《民俗臺灣》」等，逐一歸納柳田國男方法論對於《民俗臺灣》出刊編輯方向直接與間接的影響。分析編輯及投稿內容，筆者發現即使在日治時期的環境氛圍與政治影響下，臺灣仍有機會在當時建構出屬於自己的臺灣民俗學。

關鍵詞：柳田國男、民俗學、《民俗臺灣》、金關丈夫、日治時期

壹、前言

為了一個民族將來的發展，必須先探索這個民族從過往至今的軌跡，理解該民族的特質。探索一個民族過去至今的發展的方法，有透過文獻及口傳前的資料為基礎的考古學，使用文獻資料（史料）的史學，同樣的，利用口傳及慣習行事等傳承於民間的資料為基礎的「民俗學」也有其必要。¹

日本民俗學之父柳田國男（1875－1962）強調一國民俗學的重要性，主張為了理解自文化的內涵，應以全國視野的角度來關照國內的民間傳承全貌。雖然柳田國男提出的一國民俗學概念其時空背景歸咎於日本被理解為單一民族構成的國家，但是若從沖繩與愛奴族角度來看，日本列島仍潛在有族群文化的問題，這些問題至今仍少有積極的應對。雜誌《民俗臺灣》以收集紀錄臺灣漢人社會為主的民俗現況，提供研究探討臺灣，特別是漢人民俗文化的發表園地，除此之外，這份刊物藉由金關丈夫（1897－1983）、中村哲（1912－2003）、國分直一（1908－2005）等人與日本民俗學界的往來連結，²成為日本民俗學傳入臺灣的重要媒介。本論將透過雜誌《民俗臺灣》及時代背景的考察，掌握與柳田國男有關的資料進行解析，說明柳田國男在1930年代的民俗學理論及方法的建構是否影響當時於《民俗臺灣》的投稿，期待引伸出《民俗臺灣》試圖建構臺灣民俗研究的氛圍，進而培養臺灣民俗學者並創建臺灣民俗學的可能性。

近年來日治時期相關的研究議題日趨蓬勃，只不過在各種新史料接連

* 感謝本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筆者email：wasitingi@gmail.com。

1 編輯部，1943，〈點心 民俗學與民族學——回答一位讀者的疑問〉《民俗臺灣》3-5，頁21。

2 《民俗臺灣》發行人的金關丈夫曾於1928年出席柳田國男主持的民俗談話會，自此開始與柳田國男有所往來。中村哲雖身為法政學者，不過因為家族與柳田國男的私人情誼，讓中村哲從幼年即有機會與柳田接觸，可說是民俗臺灣同仁中與柳田國男關係最密切的人物。參照：中村哲，《わが学芸の先人たち》（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78年）。

出土問世之際，仍有一些研究資料毫無動搖屹立於該研究領域，其中，雜誌《民俗臺灣》對探討日治時期臺灣民俗研究議題的權威性即為代表。本論企圖藉由該誌來檢視柳田國男對臺灣民俗研究可能產生的影響，回顧歷年來相關的研究成果，特別在這數十年間，臺灣、日本學者以《民俗臺灣》為題的研究成果有顯著成長，只不過多數著作傾向於《民俗臺灣》內容及歷史背景的基礎考察，近年則有川村湊《「大東亞民俗學」の虚実》等開始從殖民主義、歷史詮釋展開議題性討論。³基礎性的研究成果方面，以當年擔任該刊編輯池田敏雄所發表的〈植民地下臺灣の民俗雜誌〉、〈柳宗悅と柳田國男の『不親切』〉、〈臺灣の民俗と民芸を語る〉三文為代表，⁴透過池田敏雄回顧所留下的細微描述，作為本論考察《民俗臺灣》當時是否受柳田國男影響的重要依據。另一位戰前重要的民族學者國分直一，雖非直接參與《民俗臺灣》核心的編輯事務，不過作為一位曾經投稿、參與該刊活動的一員，促使他發表〈中村哲先生と『民俗臺灣』の運動〉、〈『民俗臺灣』の運動はなんであつたか—川村湊氏の所見をめぐって—〉，分別從《民俗臺灣》人際網絡的關係及立足於當事者的角度來詮釋該刊真實的一面，提供筆者更清晰理解《民俗臺灣》在當時時空背景中所具有的歷史意義。

西元1996年，川村湊《「大東亞民俗學」の虚実》一書的出版，宛如為《民俗臺灣》研究開啟新的一頁，該著作涉及的議題提供不同以往的詮釋角度。確實當時國內學界對《民俗臺灣》的理解，一直夾雜在正反評價及殖民批判的氛圍，川村湊從大東亞民俗學的議題對《民俗臺灣》有諸多

3 川村湊為日本著名文藝評論家·學者，其出版的《「大東亞民俗學」の虚実》（東京：講談社選書メチエ，1996年）這本著作，讓「大東亞民俗學」一詞成為當時相關學界矚目的議題，特別就柳田國男戰前就日本統治地的臺灣、韓國等亞洲各國的影響，大東亞民俗學概念的成形及影響上提出強烈的批判。

4 池田敏雄對於臺灣議題的關心在戰後回國後仍不減熱情，這三篇收錄在《池田敏雄臺灣民俗著作集下卷》（東京：綠蔭書房，2003年）的〈植民地下臺灣の民俗雜誌〉、〈柳宗悅と柳田國男の『不親切』〉、〈臺灣の民俗と民芸を語る〉，分別針對戰前臺灣發行的民俗雜誌狀況，以及針對柳宗悅、柳田國男這兩位戰前先後訪臺，分別具有日本民藝之父、日本民俗學之父尊稱的學問，還有訪臺期間對於臺灣民藝的評價觀感等內容所做的書寫。

批判，這樣的研究視角促使更多人矚目《民俗臺灣》的研究。包含本論議題柳田國男民俗學在臺灣的受容，是否在《民俗臺灣》可見其端倪，此書提供了本論書寫不同的詮釋可能。在川村湊一書出版後，《民俗臺灣》相關議題的書寫日益蓬勃。如戴文鋒〈日治晚期的民俗議題與臺灣民俗學——以《民俗臺灣》為分析場域〉這篇博士論文的完成，⁵是國內首部以《民俗臺灣》為題的學術書寫，全篇雖對《民俗臺灣》是否受柳田國男影響並無討論，不過可作為本論掌握該誌全貌的重要參考。吳密察〈『民俗臺灣』発刊の時代背景とその性質〉賦予《民俗臺灣》相當正面的評價，⁶此書在21世紀初葉臺灣正在迷走於評價殖民與戰後臺灣的熱潮中，成為了學界客觀理解《民俗臺灣》重要參考著作。

日本人類學者三尾裕子〈以殖民統治下地「灰色地帶」做為異質化之談論的可能性——以《民俗臺灣》為例〉一文，⁷從日本人類學的立場針對《民俗臺灣》至今的研究現況進行了全面性的討論，提供了不同於川村湊對戰前《民俗臺灣》發行目的及活動意圖的解讀，扭轉國內及日本對《民俗臺灣》是在大東亞共榮圈因素下所發行的刊物的理解跟認知。陳豔紅《「民俗臺灣」と日本人》一書延續戴文鋒對《民俗臺灣》的考察與分類，⁸更細緻著眼《民俗臺灣》中所出現的人物，對這些人物的背景以及在書中所呈現的參與及思想多所琢磨。在多數集中於對《民俗臺灣》的專題研究中。邱淑珍〈柳田國男と臺灣民俗學〉是至今唯一著眼於柳田國男與臺灣議題的研究著作，⁹該文對柳田國男與臺灣的關係，以及相關歷史事實有清楚的說明，不過立論點偏重於日本殖民主義所傳來的學問與臺灣的關

5 戴文鋒，〈日治晚期的民俗議題與臺灣民俗學——以《民俗臺灣》為分析場域〉（嘉義：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年）。

6 吳密察，〈『民俗臺灣』発刊の時代背景とその性質〉，收入於藤井省三・黃英哲・垂水千惠編《臺灣の「大東亞戦争」—文学・メディア・文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7 三尾裕子，〈以殖民統治下地「灰色地帶」做為異質化之談論的可能性——以《民俗臺灣》為例〉，《臺灣文獻》，第55卷3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4年）。

8 陳豔紅，《「民俗臺灣」と日本人》（臺北：致用出版社，2006年）。

9 邱淑珍，〈柳田國男と臺灣民俗學〉，《國文学 解釈と鑑賞》，第72卷12號（東京：至文堂，2007年）。

係，對《民俗臺灣》中所存在著柳田影響與否缺乏關注。林承緯〈從金關丈夫的民藝書寫看民藝運動對臺灣工藝研究萌芽的影響：以雜誌《民俗臺灣》之〈民藝解說〉為中心〉雖非以柳田國男與臺灣為題，¹⁰是針對柳宗悅民藝美學對《民俗臺灣》影響的探討，不過全篇研究提供了對該刊與日本民藝、民俗影響詮釋另一個參考方向。植野弘子〈『民俗臺灣』にみる日本と臺灣の民俗研究——調査方法の検討を通じて——〉一文，¹¹通過《民俗臺灣》刊載的文章檢討日本民俗學方法論在當時臺灣的受容情形，其中也意識到柳田國男民俗學對《民俗臺灣》產生的影響，不過其出發點並非全然的檢視柳田對臺灣的影響，而是想討論「方法論」在《民俗臺灣》中是否有成立。

回顧戰後至今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顯示出對《民俗臺灣》的討論是可見的，但議題仍把《民俗臺灣》視為紀錄臺灣戰前民俗現象的刊物，並沒有把《民俗臺灣》導向學術性刊物進行討論。若把《民俗臺灣》視為臺灣民俗學可能發聲的媒介，為何《民俗臺灣》未能成為民俗學的學術性刊物，再者，當年柳田國男的民俗學是否影響《民俗臺灣》的發展，這些將是本論關心所在。基於以上的研究著眼與議題設定，本論扣除前言、結論，將透過三個章節來進行論述，「貳、柳田國男的臺灣經驗」將從影響柳田國男臺灣印象建構的關鍵人物談起，對於原住民的理解、鄉土研究的展開、訪臺原委等議題一一進行說明。並藉此柳田國男行腳臺灣所展開的公開演說、蕃地視察、¹²農林業造訪等過程所獲，描繪出柳田國男在臺擁有的的人脈關係。「參、《民俗臺灣》中所見的民俗」則以雜誌《民俗臺灣》為考察重心，分析該刊各文對「民俗」一詞的理解，這包含對民俗定義的掌握，以及民俗學一詞的理解詮釋。一方面也將側重柳田國男的民俗學方

10 林承緯，〈從金關丈夫的民藝書寫看民藝運動對臺灣工藝研究萌芽的影響：以雜誌《民俗臺灣》之〈民藝解說〉為中心〉，《臺灣文獻》，第61卷2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年）。

11 植野弘子，〈『民俗臺灣』にみる日本と臺灣の民俗研究——調査方法の検討を通じて——〉《東洋大學社會學部紀要》，第50卷1號（東京：東洋大學社會學部，2012年）。

12 文中部分敘述以「蕃」稱呼，例如蕃地或蕃人，此為日治時期用法，並無任何貶義。

法論是否落實於《民俗臺灣》編輯方針這方面的情形，從中檢視該刊的力量可否培育出臺灣的民俗學者。「肆、圍繞柳田國男的民間傳承談話」透過圍繞著柳田國男的座談會為議題核心，解析臺灣建構自己民俗研究方法的可能，藉此從中說明《民俗臺灣》編輯部如何實踐「調查手冊」這項民俗調查方法實作的首部曲。

貳、柳田國男的臺灣經驗

一、柳田的臺灣人脈

行そのものは実に痛快であった。まづ島を一回り、高雄の南まで行って臺北に帰ると、まちかまへてゐて歓迎会を開いてくれた。
(柳田國男，〈故郷七十年〉)¹³

這是柳田國男回憶1917（大正6）年到訪臺灣所留下的一段話，日本民俗學之父柳田國男曾在擔任貴族院書記官長期間到訪臺灣，在十餘天的停留期間，柳田國男走訪全臺展開視察旅行。這場距今正好將滿百年的訪臺行程，是柳田生前唯一的渡臺，究竟柳田造訪臺灣的原因為何，此行前後對臺灣的理解是否產生改變，這些都是本篇幅希望探討的焦點。在此之前，我們先從柳田國男與臺灣可能的接點談起，西元1895年4月清國在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之下，臺灣成為日本第一塊海外殖民領土，日本國內對臺灣的關心隨著政治領有下，臺灣的史地、環境、資源、人種也受到日本國內學術各界的注目。當時著名的人文研究刊物《東京人類學會雜誌》即在1895年10月刊登平野秋夫〈臺灣生蕃視察概況〉一文，是日本政府領臺

13 柳田國男，〈故郷七十年〉，《定本 柳田國男集》別卷第3（東京：筑摩書房，1970年），頁1-2。

後首篇關於臺灣原住民的實地調查報告，而這篇文章即可能是該刊忠實讀者柳田國男首度接觸到的臺灣。柳田擁有數名與臺灣關係密切的親友，其中叔父安東貞美（1853－1932）擔任臺灣總督、友人內田嘉吉（1866－1933）、下村宏（1875－1957）前後擔任民政長官，這些私人情誼可謂柳田在出訪中國之前先行造訪臺灣之因。除此之外，出身於遠野的臺灣研究先驅伊能嘉矩（1867－1925），亦是另一位開啟柳田國男關心臺灣的關鍵人物。

遠野出身的人類學家伊能嘉矩在日本領臺開端的1895年，即渡海來臺展開全島規模的歷史及人類學調查，其研究成果定期在《東京人類學會雜誌》以〈臺灣通信〉專欄定期發表。柳田與伊能的往來，始於1908年伊能嘉矩結束臺灣調查隔年，當時柳田國男一位出身遠野的青年友人佐佐木喜善（1886－1933）來訪，柳田透過他口中獲知遠野一帶豐富的傳說民話，促使他隔年來遠野調查並拜訪伊能嘉矩。兩人在會面中暢談遠野的傳說，日後也透過通信保持學問上的往來，這些內容日後也成為《石神問答》及《遠野物語》二書的撰寫依據。值得一提的是，1911（明治44）年伊能嘉矩將《臺灣蕃政誌》一書贈與柳田，此舉開啟了柳田對臺灣原住民的關心。¹⁴柳田國男在為小林保祥《高砂族パイワヌの民藝》撰寫的序文中，¹⁵便以「年壯學徒的熱情」一詞呈現積極閱讀《蕃族調查報告書》及《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等書的心境。而柳田國男與伊能嘉矩在鄉土調查議題上表現的熱切互動，更促使1928年也就是伊能嘉矩死後三年，其代表作《臺灣全志》遺稿在柳田的協助下，交由東京刀江書院正式出版名為《臺灣文化誌》，這些事蹟皆顯示兩人深厚的情誼。

若說西元1895年起散見於《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的臺灣原住民相關研究報導，以及伊能嘉矩贈與《臺灣蕃政誌》成為了柳田認識臺灣的窗口，

14 邱淑珍，〈柳田國男と臺灣民俗學〉，頁43。

15 小林保祥《高砂族排灣族的民藝》一書出刊於1944年，柳田國男為此書作序，藉由自己過去閱讀《蕃族慣習調查報告》的經驗，闡述對臺灣原住民族的關心及對於小林保祥此書的推崇。

前述時任臺灣總督的安東貞美、民政長官下村宏，甚至前任民政長官內田嘉吉等柳田國男的親友之邀，¹⁶可說是促使1917年時任貴族院書記官長的柳田國男基於公務原因前往中國視察，並順道旅行臺灣的主因。¹⁷其實柳田國男除了這兩方面與臺灣的交集，新渡戶稻造（1862－1933）的影響相信也不可忽視。如眾所周知的，曾任職於臺灣總督府，對臺灣農業盡力的新渡戶稻造不僅以*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一書聞名於世，也為近代日本著名的思想家、農經學者。新渡戶稻造於1909（明治42）年曾創辦名為鄉土會的研究組織，提倡針對鄉土的民間制度、傳承文化展開調查研究，其中柳田國男不僅參與其中，並擔任雜誌《鄉土研究》的編輯工作。¹⁸新渡戶稻造對鄉土議題的關懷獲得柳田的共鳴，同屬農政背景的兩人關係密切，推測柳田可能藉此增添對臺灣的好奇，這些都可視為引領柳田來臺之因。事實上，1917年到訪臺灣的行程並非柳田國男申請海外出差的主因，根據柳田國男向貴族院提出的出差公文顯示，¹⁹前往中國考察議會制度為此次海外出差目的，至於訪問臺灣應該是順道安排的行程。根據《定本柳田國男集》收錄的〈年譜〉，清楚記錄下全程經歷：「自三月二十日日起兩個月，曾旅行臺灣、中國、朝鮮。在臺北宿於叔父臺灣總督安東貞美住處。四月十一日，抵廈門觀光。四月二十五日，香港，四月二十九～五月二日於上海，曾會晤唐紹儀、孫逸仙，孫洪伊。五月四日～七日，旅行漢口、南京，並謁見黎元洪大總統。五月二十日，經北平、大連、京城、於六月二日返宅。²⁰」由此可知，此行兩個多月的旅程多為視察中國，而來臺旅行

16 關於訪臺的原因，柳田國男於《故鄉七十年》這本回憶錄中娓娓道出緣由，由此顯示出柳田國男在臺擁有的私人交友網絡，促使他利用前往中國出差視察中央及地方議會制度途中短暫來臺視察旅行。

17 柳田國男，〈臺灣から広東へ〉，《定本柳田國男集》{別卷3}（東京：筑摩書房，1985年），頁386。

18 雜誌《鄉土研究》是柳田國男、高木敏雄共同編輯下的一本民俗學專門月刊，自創刊的1913年到1917年停刊這段主要發行期，收錄了柳田國男、折口信夫、南方熊楠等人論著，是日本民俗學朝向學科發展階段重要的一本專業刊物。

19 關於柳田國男此行的行政文書，引自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數位典藏系統所收〈貴族院書記官長柳田國男外一名支那へ出張ノ件〉《內閣府・總理府／行政文書》（任B00801100）。（網址<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查詢日期2016/4/21）

20 柳田國男，《定本柳田國男集》{別卷5}（東京：筑摩書房，1982年），頁632。

為啟程出發的3月27日至4月10日這段期間，以下就針對柳田國男來臺的行程進行詳細描述。



圖1：1917年前往臺灣、中國、朝鮮旅行前的柳田國男與兒女千穗、為正、千枝合影。（從左至右）

資料來源：宮田登/編輯・評傳，《新潮日本文学アルバム5柳田国男》（東京：新潮社，1984年），頁48。

二、臺灣旅行的展開²¹

西元1917（大正6）年3月24日，柳田國男從門司港搭乘信濃丸前往臺灣，²²於27日清晨五點抵達基隆。隨即轉乘火車前往臺北，柳田國男於車中

21 關於柳田國男來臺的行程，此小節詳細描述資料來自於《臺灣日日新報》及《臺灣大年表》，為了便於閱讀，多處細節資料不再另外標明出處，必要時以註解加以說明。

22 《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3月24日，版2。門司港，今福岡縣北九州市門司區，柳田國男一行人搭乘3月24日傍晚四點啟程的信濃丸前往臺灣，歷經三日航行於27日清晨五點抵達基隆，夫人柳田孝也同行。

第一場公開行程，²⁵列席臺灣總督府高等女學校畢業典禮。²⁶隔日一早，柳田國男與總督安東貞美、民政長官下村宏等人搭車前往臺灣神社參加月次祭，²⁷接著轉往臺灣總督府臺北中學校列席參加畢業典禮。訪臺第三日上午九點半，前往臺灣銀行進行視察聽取營運報告，在約一小時短暫停留後，前往農事試驗場列席農事講習會的畢業典禮。²⁸當日下午三點，柳田國男受臺灣教育會之邀在總督府醫學校講堂進行演說，會中以「上書院書記官長法學士」來介紹柳田國男。²⁹柳田在這場唯一在臺的公開演講中，針對當時社會對學問的態度偏向功利性進行分析並說道：「研究學問是提升人類內在價值的唯一途徑。」最後也暢談臺灣原住民的傳說，其豐富的知識及流暢的口才令在場將近150位的知識份子用心傾聽有感，獲得全場滿堂的喝采。³⁰

柳田訪臺前三日行程集中在臺北，內容幾乎都是公務行程，像是訪問公立學校列席畢業典禮、參拜臺灣總鎮守臺灣神社、視察銀行及農業機構等，大致上為日本本土皇族高官訪臺常見的行程安排。關於柳田國男選擇

25 查閱大正年間日本本土皇族高官訪臺的行程，參訪內容不外乎是政府機關、銀行、學校、農業改良設施等地，譬如1916年先後訪臺的閑院宮載仁親王、久邇宮朝彥親王等皇族的行程，柳田此次訪臺基本上也跟這些要員的行程規劃相當類似。參照：緒方武歲編，《臺灣大年表》（臺北印刷株式會社，1938年；復刻本：臺北：南天書局，1994年），該書1915-1918年相關記事篇幅。

26 《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3月28日，版7。當時同場列席者還有民政長官下村宏、民政部學務部長隈本繁吉等多位官員。

27 《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3月29日，版2。臺灣神社於28日上午八點在神社社殿舉行月次祭，安東總督與前日來北的柳田上院翰長、民政長官下村宏及臺灣總督府副官安井義之助、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兩位秘書官木村通、石井光次郎，一起搭車前來參拜。

28 《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3月30日，版2。目前來臺的柳田貴族院書記長在二十九日上午九點半到臺灣銀行訪問，在聽取中川副頭取所做的營業狀況報告之下，也參觀了各室情況。在十點半離開趕往農事試驗場列席畢業典禮，之後視察其他設備，下午三點前往演講會場。

29 西方民主制度發展出兩院制的國會，包含上議院跟下議院，日本在戰前將上議院稱為貴族院。柳田國男在1914-1919年任職於貴族院書記官長。臺灣日日新報用上議院書記官長稱呼柳田，其實是為貴族院書記官長，柳田國男也為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政治科，因此臺灣日日新報在柳田訪臺期間除了用柳田翰長尊稱外，也以「上書院書記官長法學士」來介紹柳田。貴族院（上議院），眾議院（下議院）並不是透過選舉選拔，是透過內閣會議決定，天皇任命而來，直接接受議長指揮，書記管長也統任管理內閣及議院事物。參閱「日文版維基百科」：https://ja.wikipedia.org/wiki/貴族院_%28日本%29（2016/11/21查閱）<https://ja.wikipedia.org/wiki/wiki/書記官長>（2016/11/21查閱）

30 《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3月30日，版2。

於出差中國途中訪臺之因，一般最容易聯想的即是當時擔任臺灣總督的叔父安東貞美，亦有一說認為柳田訪臺是因下村民政長官為報答柳田當年推薦之恩所致，柳田國男在《故鄉七十年》這本回憶錄中回想起那次的訪臺，說道：「很多人都覺得下村擔任民政長官是因為我推薦他給我叔父的。下村可能聽到這個傳言就邀請我到臺灣好招待我。其實在內田嘉吉當民政長官的時候，就準備邀請我訪臺了。我非常樂意接受他的邀請訪問臺灣，所以在沒有跟貴族院議長商量下，就擅自提出申請，啊～這是我失敗的地方。雖然如此，這次旅行可真是痛快！」³¹從柳田國男自述中可得知，他在當時臺灣政界高層擁有的人脈，再加上前述如伊能嘉矩、新渡戶稻造等柳田人際網絡中具臺灣經驗者的影響，相信此行的目的不僅在公務視察，還包含了訪友省親及學問探索、增廣見聞等目的。

第四天起柳田國男南下前往視察原住民，在下村宏的帶領下，柳田與同時間訪臺的太田總領事一同搭車前往，³²列車經縱貫線抵達中部，再轉搭糖廠臺車往山區移動，首站抵達日月潭。一路舟車勞頓後柳田國男在日月潭旁茶亭小憩飽覽地形風光，隨後來到埔里社下榻當地最豪華的旅館日月莊。³³4月1日早上六點開始往霧社移動，柳田一行搭乘臺車至眉溪部落下車，當時見到原住民盛裝前來迎接，稍微休憩後一行人步行及乘人力轎前進霧社蕃地，到達霧社已是中午時間，在地官民踴躍迎接，柳田特別熱衷於地形及勝景的欣賞還建議在霧社留宿一晚，不過提議無疾而終，柳田也在霧社原住民參訪吟誦了幾句和歌，³⁴當夜返回埔里日月莊再宿一晚。

31 柳田國男，《定本柳田國男集》{別卷3}，頁386。

32 太田喜平為安東貞美的女婿，曾擔任臺灣總督官房外事課事務官，而後升任日本駐廣東總領事一職。柳田訪臺行程多數被安排與太田同行。

33 日月莊又名日月館，是由1910年原田源吉開設於埔里街的日式旅館，這座旅館占地達千餘坪，擁有豪華的設施及庭園，可謂當時造訪埔里、霧社等地的官員主要的投宿地點。

34 《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4月10日，版2。

三、霧社蕃地視察與訪臺收穫

探訪原住民是柳田訪臺令人矚目的焦點之一，為何柳田選擇到霧社進行視察，推測應與民政長官下村宏有關，³⁵選在柳田訪臺之際主要是配合柳田國男對山人議題的關心，而將霧社蕃地作為招待柳田國男的重要行程。霧社地處偏遠交通往返無法全程採汽車移動，所以從埔里前往須分段採臺車、乘轎及部分徒步，路途來回奔波無法一日完成，故需在埔里住宿兩晚。也因此，原定4月1日離臺轉往中國視察的柳田國男，即可能因前往霧社蕃地探訪而延後離臺的時間。試想柳田對臺灣原住民議題產生興趣的起點，除了與伊能嘉矩交友往來及閱讀《蕃族調查報告書》等著作，柳田在新渡戶稻造成立於1910年的「鄉土會」中擔任幹事，而後又與南方熊楠的通信、與神話學者高木敏雄（1876—1922）共創雜誌《鄉土研究》；以及在中山太郎（1876—1947）引介下認識折口信夫（1887—1953）等，都使柳田對探訪臺灣及原住民的興趣持續增加，進而在下村民政長官安排下選擇了模範村的霧社作為柳田訪臺的視察地。

柳田國男於臺北出席這場歡迎會後，隔日再度南下臺中，4月7日一早前往臺中神社參拜，順道遊覽公園風光拍攝紀念照，接著前往中學校、農場、吳鶯旂氏邸宅、法院等地視察。中午出發到后里庄蔗苗養成所，聽取藤野糖務課長詳盡的報告之後返北。³⁶在《臺灣日日新報》所刊載的柳田國男訪臺行程中，前後出現他兩度視察蔗苗養成所的情形，若不是當時報導有誤，則顯示農政學出身的柳田對於新渡戶稻造指導下所改善臺灣蔗糖栽植所創設的蔗苗養成所的關注。訪臺尾聲，下村宏於北投無名庵設宴招待柳田。柳田先到北投公共浴場的特別沐浴室泡過溫泉，再前往晚宴會場無名庵欣賞周邊景致，眾人飲酒談話盡歡，直到九點入夜才結束這場歡送聚會。³⁷這場訪臺之行於4月10日落幕，柳田國男由早起會的社員及赤石本

35 《臺灣大事記》，1917年3月，頁106。

36 《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4月7日，版3。

37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4月11日，版5。

社長接送下前往臺北車站，換搭最早的火車前往基隆，再乘坐襟裳丸往中國，出發前有許多官民前來送別，離臺後預計先前往香港、廣東，再北上經福州、上海等地後返回日本。³⁸

這次的訪臺對柳田國男來說，有不少是預料外的變化，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停留時間從原訂的3月27日至4月2日，更改為4月10日才趕赴中國，延長了一週以上的停留，顯示出臺灣旅行帶給柳田國男預期以上的收穫，這十五天走訪了臺北、二水、日月潭、埔里、霧社、南投、嘉義、臺中、北投等地，深入臺灣中部山岳地帶的霧社探訪原住民部落，同時來到臺北的農事試驗場、嘉義的林業事務所、製材工廠及臺中蔗苗養成所，可說是除了在日月潭小憩及臺北市內公務拜會之外，絕大多數的行程皆集中於農林業視察。另一方面，譬如柳田國男於鐵路飯店那場歡迎會，朗誦和歌提及的西螺或西來庵、還有高雄與阿猴等地名，根據最詳盡報導柳田國男訪臺行程的《臺灣日日新報》所見，難以證實正確視察的時間點，關於臺南、高雄、屏東一帶的訪問未見任何紀錄。這讓柳田國男當年是否來到噍吧哖事件現場理解1915年發生這場宗教抗日事件的疑問仍無法解開，不過這章節根據柳田國男訪臺歷程所做的描述紀錄，至少提供了理解柳田國男1917年臺灣旅行全貌完整的過程，然而柳田在臺灣所見所聞是否對日後推動的一國民俗學建構產生影響，相信臺灣平地社會中的漢人、山中原住民的文化內涵，對正結束雜誌《鄉土研究》的柳田國男來說，是一道值得注意的研究轉折，這是至今多數涉及柳田國男與訪臺等議題所忽視的。

38 《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4月11日，版2。

參、《民俗臺灣》中所見的民俗

一、關於《民俗臺灣》

《民俗臺灣》是第一本以研究、介紹臺灣民俗文化為題的月刊雜誌，其出刊目的明確標示如封面的「研究、介紹、風俗與習慣」。在局勢動盪且物資缺乏的日治末期，《民俗臺灣》從1941年7月創刊至1945年1月停刊為止，共發行了43期。時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的人類學者金關丈夫為《民俗臺灣》創刊的催生者、編輯人，然而實際從事編輯策畫等事務者，則是由年輕的民俗研究者池田敏雄（1916—1981）一肩挑起。1941年5月，在金關丈夫、萬造寺龍、須藤利一（1901—1975）、岡田謙（1906—1969）、陳紹馨（1906—1966）、黃得時（1909—1999）六人聯名下，發表雜誌刊行〈趣意書〉，向社會大眾說明《民俗臺灣》發刊背景緣由及目的。內容可見雜誌同仁在皇民化期間感受到臺灣舊有慣習即將面臨消滅的危機感，因而希望可以加以記錄、研究。而在後續金關丈夫陸續發表的文章中也提及期盼雜誌《民俗臺灣》可扮演一個討論交流的平臺，並期待藉此園地培養出臺籍民俗學者。³⁹

雖然《民俗臺灣》刊行時間已進入情勢動盪的日治末葉，不過在金關丈夫等有志之士的號召下，仍吸引任職於臺北帝國大學的政治學者中村哲、社會學者岡田謙（1906—1969），當時活躍於臺灣的版畫家立石鐵臣（1905—1980）、攝影家松山虔三、民族學者國分直一，以及陳紹馨、楊雲萍（1906—2000）、黃得時、黃連發（1913—1944）、吳尊賢（1916—1999）等臺籍知識分子參與。在短短數年間，《民俗臺灣》不僅累積可觀的臺灣民俗文化採集成果，並成為研討臺灣尤其是漢人民俗議題的重要發表園地。也因為金關丈夫、中村哲、國分直一等人與日本國內民俗學界的往來連結，《民俗臺灣》亦成為日本民俗學、民藝理論等學問傳入臺灣的重要媒介。

39 金關丈夫，〈點心 民俗諦視の新意義〉《民俗臺灣》3-10，1943年，頁27。

從《民俗臺灣》看柳田國男對臺灣民俗研究的建構與可能



圖3：雜誌《民俗臺灣》創刊號，
1941年7月15日。

資料來源：《民俗臺灣》創刊號封面（臺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1941年7月15日）。

這本堪稱臺灣民俗研究發展絕無僅有的刊物，雖以民俗之名發刊，但是不把雜誌定位為學術性雜誌，期許能吸引各領域關心臺灣民俗文化人士的矚目。全刊內容除了民俗以外，也兼顧鄉土史、地理、考古、自然誌等領域，採集、紀錄、介紹、分析的知識建構導向，加上聯絡、交流、對話、推廣的學問啟蒙性格，再透過金關、池田二人巧妙的專欄議題企劃加以實踐，讓這本每期僅數十頁的《民俗臺灣》得以實現該刊設定的發刊目標。舉例來說，「卷頭語」以簡潔的文字評論時事動態並引申與民俗研究對話，而「亂彈」、「點心」與「消息通訊」、「編輯後記」等專欄，則肩負起讀者間投書交流及雜誌編輯部所提示的議題導向、研究動態。除此之外，也具有表達對時局、社會等意見的功能，像是對於民俗、民俗學

的學科論述，還有針對民俗舊慣的革新改良等議題都留下豐富的成果。此外，「文獻介紹」、「書評」定期介紹最新的民俗研究相關出版訊息，「民藝解說」、「臺灣民俗圖繪」這兩則圖文並茂的專欄，則系統性的透過圖文、寫真來描述傳承於臺灣民間的手工藝、民藝之美。⁴⁰還有一項特別的專欄是「民俗採訪會」，《民俗臺灣》編輯部定期策畫各地鄉土文化的採訪活動，曾走訪過士林、大龍峒、艋舺、新莊、鶯歌等地，進行實地考察及同好交流。多彩豐富的《民俗臺灣》活動形式，讓這本雜誌所能發揮的影響力不僅止於書面閱讀，日本民俗學著重的現地調查態度，在該刊編輯部規劃下定期擇一地辦理民俗採訪會，這是探究雜誌《民俗臺灣》是否受到日本民俗學影響不可忽視的一項關鍵指標。

十九世紀英國考古學者William John Thomas (1803-1885) 提出Folklore的概念，民俗一詞是從這個概念翻譯得來，在柳田國男仍迴避將「民俗」、「民俗學」作為學科專有名詞的年代，《民俗臺灣》這本以研究、介紹臺灣民俗為志的雜誌，已直接將研究對象的「臺灣民俗」倒反作為刊名。那麼，作為一本民俗學專題的刊物，該如何理解界定民俗的概念，是否將民俗學視為獨立學科展開討論？筆者以為用詞反映了一本刊物的出版定位，這點可透過刊物編輯慣用詞句、專題屬性設定及投稿者用詞加以理解。當1935（昭和10）年柳田國男透過《民間傳承論》一書倡導並定義「民間傳承」、「常民」等重要的民俗觀念，《民俗臺灣》各期文稿如何運用這些用詞、觀念來展開民俗討論，是否受到柳田國男為首的日本民俗學體系影響，是接下來篇幅矚目的焦點。

40 關於《民俗臺灣》篇幅所見民藝之美這方面的討論，可參照林承緯，〈從金關丈夫的民藝書寫看民藝運動對臺灣工藝研究萌芽的影響：以雜誌《民俗臺灣》之〈民藝解說〉為中心〉，《臺灣文獻》，61卷2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年）一文有詳盡的說明。

二、《民俗臺灣》中所見的民俗

金關丈夫在《民俗臺灣》創刊號卷頭語中寫下：「我們一起愛護紀念物吧。可是，假使天意不容許它持續流傳——它的存續（或是命運）只能由時間來決定——至少我們應該努力留下它的完整紀錄。」⁴¹這一段話表現出金關丈夫對傳承文化保存的重視，細細解讀我們會發現金關特別強調不要放任物件自生自滅，至少就能力所及，應透過完整紀錄的方式加以保存。而被金關丈夫認為是該刊核心執筆者中唯一內行人的岡田謙，⁴²曾在《民俗臺灣》創刊號發表〈關於民俗〉中針對民俗學的內涵及本質展開定義。⁴³行文中也點出紀錄民俗資料的正確觀念，引用務台理作（1890—1974）對傳承文化的詮釋來定義民俗，⁴⁴同時也參照德國民俗學者Hans Naumann（1886—1951）對民族文化構造提出的表層文化、基層文化之說。最後指出民俗並非固定不變，認為目前的當務之急是客觀紀錄民俗，岡田謙也深信這是《民俗臺灣》的發刊目標。

岡田謙一文共分成三部分寫下對民俗的理解，身為《民俗臺灣》的發起人，更有對《民俗臺灣》未來發展的期待與使命感。岡田謙定義民俗為一個民族、一個區域集團（鄉土集團的）的鄉土文化，並談到：「關於傳承文化的特質，就像務台理作確切所指的那樣…」。⁴⁵文中以「傳承文化」來置換「民俗」的概念用詞，顯示出岡田謙對務台理作詮釋民俗的理解。務台理作論述民俗三特質的首要是：「經常反覆的性格，時日一久便構成類型，再形成一種集團。鄉土的風俗並非某個人在哪時候創造的，是長時

41 金關丈夫，〈卷頭語〉，《民俗臺灣》1-1，1941年，頁1。

42 編輯部，〈座談會 柳田國男氏を囲みて 大東亞民俗學の建設と《民俗臺灣》の使命〉，《民俗臺灣》3-12，1943年，頁2-15。金關丈夫在座談會中指出岡田謙是編輯部中唯一的內行人，此處的內行人可理解為具有學科研究方法的研究者。

43 岡田謙，〈民俗について〉，《民俗臺灣》1-1，1941年，頁2-3。

44 務台理作（むたいりさく、1890年8月8日-1974年7月5日）為日本哲學家。歷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東京文理科大學教授、慶應義塾大學教授、東京教育大學名譽教授。參閱日文維基百科「務台理作」詞條：<https://ja.wikipedia.org/wiki/>（2017/1/6查閱）

45 同註43。

間由父傳子、子傳孫，人們世代反覆相傳所形成。所謂的反覆也就是並非出自於個人，是來自於集體的創造所得。也因是集體所以能構成各自的類型。技術、祭禮、口碑傳說、歌舞、遊戲，沒有一個不是集團型態的呈現。而且無一不存在固定的類型。」⁴⁶這裡所見的首要特質是團體內部經世代傳承且非個人獨自完成的固定類型，如此一來才符合經常反覆的性格，至於少數個人並非傳承所得的團體行為，則不在討論範圍內。

第二個特質為：「顯著的實踐性，為達到鄉土生活實踐所需而反覆的傳承。民俗會反覆存在是為順應鄉土集團的實踐所需。如此實踐的性格，也就是深根於生活的性格，帶給人們熱情的實踐性若喪失的話，傳承將會在鄉土生活中消失。當然說到深根於生活的意思，並非僅止於食衣住等直接的生活內容，像是宗教這方面更是對生活有另一層的重要意義。」⁴⁷其重點為顯著的實踐性，也就是在熱情的實踐原則下，深根於生活實踐的傳承文化在反覆中存續保留，在此所提示的實踐性也包含經常反覆的前提。第三特質為「並非個體或普遍性，而經常帶有明顯的特殊性。」⁴⁸這點會使鄉土集團即使面對與自己具同類型的傳承文化時，也會認為自己是獨有且特殊的，更能讓他們在經常反覆、顯著的實踐下仍保有一股強烈的活力。如此一來，看似普通卻環環相扣的三要素即構成了傳承文化，也就是民俗的三大要件。岡田謙接著談到德國著名的民俗學者Naumann. H.將民族共同體分成表層文化與基層文化之說，如此的文化詮釋不僅可視為解析一民俗文化的觀點，亦可作為檢視一文化體內涵結構的論述。

在《民俗臺灣》發刊的1940年代，柳田國男建構的民俗學理論已儼然成型，自一戰過後，日本社會面臨巨大的轉型期，而柳田國男在這時候的國民國家社會構想也成為民俗學誕生的背景。關東大地震之後，柳田國男辭去了國際聯盟委任統治委員一職回到日本，此時期柳田積極展開民俗

46 同註43。

47 同註43。

48 同註43。

學理論及方法的建構，並將之導向經世致用之學。除了方法論「方言周圈論」、「重出例證法」的提出，也陸續出版《青年與學問》、⁴⁹《明治大正史世相篇》等闡述當時社會現象及學問構想的書籍，⁵⁰其講述理論及調查方法的兩本著作《民間傳承論》⁵¹及《鄉土生活研究法》的出版，⁵²更奠定柳田國男在民俗學界的權威地位。然而，岡田謙在《民俗臺灣》中反倒未提及柳田國男的民俗學理論，反而引用務台理作歸納的民俗特質進行討論，或許我們可以從岡田謙與務台理作的關係看出端倪。1928年務台理作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教授，岡田謙則擔任臺北帝大助手，相較於柳田國男一路從農政學發展至民俗學，任教於臺北帝大的務台理作在岡田謙的理解中可謂學院的代表，而柳田則是出身在野的民俗學的代表。⁵³因此岡田謙很自然引用學者之言，再者，雖然柳田在1934年相繼推出《民間傳承論》、《鄉土生活研究法》兩書，但對於出身社會學的岡田謙未必熟悉。文末岡田謙闡述自己對民俗的想法，指出：「民俗絕非固定不變的，是經常在變遷中存在。民俗受新文化的影響，在適應之中自行變容，一方面也對新文化產生影響。因此，若要讓民俗固定不變將是徒勞無功的。」⁵⁴說明民俗現象的存在是在反覆傳承的過程中不斷變化，因此變動是可預期的，也提出「我們必須要好好留意變化的樣子，其中將存在一定的法則，只要能掌握這項法則，將可開啟民俗意識改善之道。」⁵⁵的看法。

49 柳田國男，《青年與學問》（日本青年館，1928年）。

50 柳田國男，《明治大正史 世相篇》（東洋文庫，1967年）。

51 柳田國男，《民間傳承論》（東京：共立社，1934年）。

52 柳田國男，《鄉土生活の研究法》（東京：刀江書院，1935年）。

53 這裡所指用的在野一詞，實際上要區別的是學院與非學院的意思。

54 同註43。

55 同註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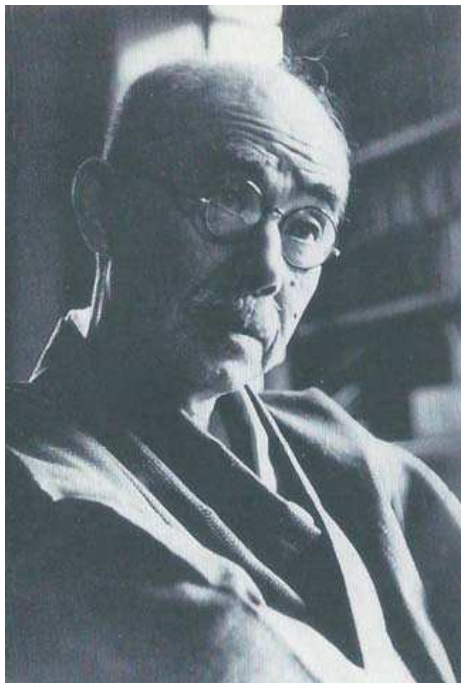


圖4：柳田國男於1960年。

資料來源：宮田登/編輯・評傳，《新潮日本文学アルバム5柳田国男》（東京：新潮社，1984年），頁9。

岡田謙在此提示的民俗意識改善之見，就該文內容及主旨研判，並非是改善革新民俗陋習的主張，而在傳達民俗文化傳承的動態、傳播、受容等正常的發展軌跡。也就是說漢文化在同化政策厲行此刻，文化內涵隨之變化的另一面，加諸於漢文化之上的同化力量亦可能出現，民俗變化的性格是岡田謙所強調的，也因此，必須先具備對民俗觀念正確地理解，才是展開民俗紀錄及研究的關鍵。「法則存在於事實中而不在外，因此有必要忠於事實來談法則，現在的當務之急是避免因性急所造成的主觀性解釋，要按部就班來描述事實。」⁵⁶則是希望《民俗臺灣》同仁及投稿者的首要工作為確實紀錄民俗，避免多餘的解釋造成主觀性的片面認知而影響大眾。「要按部就班來描述事實」之說，在以全臺灣為調查地的情況下，紀錄民

56 同註43。

俗為第一優先工作，後續則能對採集資料進行科學性的歸納分析。

岡田謙身為《民俗臺灣》發起人，雖然他的立場不能完全代表《民俗臺灣》，但是懇切的提出當時學界對民俗定義及引用德國的理論來說明，確實可視為當時臺灣理解民俗意涵的關鍵性指標書寫。除了岡田謙對民俗定義所述的關鍵文章，我們也可透過幾篇發表於《民俗臺灣》的專欄來瞭解當時大家對民俗學的理解及想像。金關丈夫在發刊首年第三號的〈編輯後記〉中提到民俗學在臺灣尚未脫離資料採集的初步階段，也請同仁投稿不需拘泥文章的巧拙，只要詳實記錄民俗內容，強調資料採集的重要，⁵⁷金關對於民俗學發展初期的分工概念呈現於此，這也是對《民俗臺灣》內容的想像。

發刊初期的《民俗臺灣》可見岡田謙、金關丈夫兩位人類學者接連撰文闡述民俗學的基本概念及調查方法，此課題在發刊第二年由《民俗臺灣》舉辦的一場現地民俗採集之中，也出現類似的討論，顯示此刊積極希望樹立刊物的風格及建構民俗研究的模式。這場民俗採集會舉行於臺北大龍峒，當日參與者一行參觀了孔廟、保安宮、老師府等地，會後眾人前往大稻埕山水亭進行茶話會的話題討論。全程參與活動的中村哲在觀察民俗採集活動之後，於茶話會中提到「民俗研究與採集方法」之異同，了解舊有習俗的第一步是要從身邊不起眼的事物觀察著手，強調民俗書寫必先忠於記錄陳述。暫且不要引用文獻，與會同仁多數第一次接觸民俗研究及採集方法，顯示大家對方法論的陌生，而這場茶話會的結論是希望可召開民俗研究方法的講座。⁵⁸在發刊第三年，我們可以看到《民俗臺灣》陸續出現對學科定位及民俗研究範圍的討論，又如編輯部在〈點心〉專欄回覆讀者的疑問，論及民俗學與民族的差異中說道，民俗學的基礎資料來源為口傳及慣習形式，文中編輯部也讓民俗學以學科之姿與考古學、史學相提並

57 T·I·1941，〈編輯後記〉，《民俗臺灣》1-3，頁48。

58 中村哲，1942，〈茶話會的話題〉，《民俗臺灣》2-6，頁45。

論。⁵⁹《民俗臺灣》從初期界定以忠實記錄為本的定位，至發刊三年後開始出現對不同學科研究差異的疑問，由於民俗與民族這兩字的日文讀音相同，在大家對民俗與民族的研究方法與關注重點尚未全然理解的氛圍下，可見編輯部回覆讀者在不同國家對民俗研究的方法及認知不同所做的說明，同時也介紹柳田國男與關敬吾共著《日本民俗學入門》一書提供讀者閱讀以理解其中的異同。⁶⁰《民俗臺灣》將民俗研究當作一門學科討論並試圖釐清與相近學科的關係，也將方法學入門書籍介紹給讀者，但徵稿內容卻也不侷限於民俗學的記錄，並歡迎各界多方的投稿。如此廣納文章論稿，除了讓投稿量提升，也可促進《民俗臺灣》內容多元化並成為一大交流平臺。

在關於民俗研究範圍展開討論的文章，可見於臺北高等學校教授鹽見薰發表〈卷頭語 臺灣民俗研究的一個分野〉一文，⁶¹文中強調臺灣的民俗研究在掌握了本島人與高砂族以外，內地人的生活研究也是一個特別需要開展的研究新領域。日本領臺五十年中，內地人為了適應新的環境，其所屬的生活包含食衣住行等，被本島人影響了多少，影響之下造成的變化及原因都是開始需要探究觀察的。也就是說除了本島人在接受皇民化政策下所產生傳承文化的變動之外，生活在臺灣的內地人也為了適應新環境而改變原本的風俗慣習。鹽見薰這篇1943年發表於卷頭語專欄中提及的想法，我們可將之與1941年岡田謙發表於創刊號的〈關於民俗〉一文相加對照，岡田謙強調「民俗絕非固定不變的，是經常在變遷中存在，而民俗受新文化的影響，在適應之中自行變容，同時也對新文化產生影響。」⁶²傳承文化在運行中產生變遷這點跟鹽見薰期望同仁開啟在臺日人生活研究的觀點不

59 編輯部，1943，〈點心 民俗學與民族學——回答一位讀者的疑問〉，《民俗臺灣》3-5，頁21。

60 本書完成於民間傳承之會體制時期，柳田國男為提供民俗學徒一本調查手帖，進而開始收集整理調查項目，因資料豐富更直接編寫成書並命名為民俗學入門。全書章節依照柳田國男的民間傳承分類，針對各種民俗項目進行專題描述，每項透過簡短文字概說日本當時傳承樣態，接著百條以上的調查項目。緒論與結語簡要說明民俗學的目的、動機、範圍、學科性格及面臨問題等，是日本民俗學第一本系統性的教科書。

61 鹽見薰，〈卷頭語 臺灣民俗研究的一個分野〉，《民俗臺灣》3-8，1943年，頁1。

62 同註43。

謀而合。在以漢人為主紀錄的前提下，卻也不能忽略在臺日人面臨的改變，而民俗受時空環境改變下產生的變容，正是兩人在發刊初期及中期所共同關注的議題，還有對民俗意涵的理解與詮釋。

三、紀錄與培育：柳田影響下的《民俗臺灣》

在《民俗臺灣》開始可見對學科、研究方法等想法闡述的文章後，金關丈夫於第三卷第十號〈點心 民俗諦視の新意義〉一文中語重心長地指出，實際進行刊物的編輯、校正實務者均為對民俗關心的素人。由這裡我們可知，身為編輯人的金關丈夫即使已任臺北帝大醫學部教授一職，並與日本國內民俗學界有所交流，仍謙虛地認為自己非屬民俗學專業，更指出「（前略）…本雜誌的使命是營造民俗研究環境，培養真的臺灣民俗學者，祈禱這樣的狀況趕快來臨。」⁶³臺灣民俗學者一詞在這裡首度出現。如此清楚的目標是金關丈夫所殷殷期盼的，對研究異民族的民族學者來說，以母語研究自身文化的民俗學者才是臺灣所真正欠缺的。而編輯部這邊於第四卷第五號〈卷頭語 臺灣民俗研究 特殊課題〉一文，也接連說到若以柳田主導的雜誌《民間傳承》來做臺灣研究的依據，⁶⁴則能促使《民俗臺灣》成為臺灣民俗學的核心成果。在發刊四年後，編輯部的目標是希望透過雜誌平臺建構出屬於臺灣的「民俗學」。而當時處於太平洋戰爭的非常時期，對民俗記錄及內臺習俗相互交融下產生的同化等影響，使得除了投入舊俗調查之外，相關民俗同化的記錄似乎也同等重要。對《民俗臺灣》編輯部來說，特殊課題的研究成果將有助於國家政策的推行，但在兩相訴求同步進行下，臺灣民俗學在建構及記錄實也刻不容緩。

《民俗臺灣》發刊是為了研究記錄臺灣慣習這點無庸置疑，還有一點是培育真正的民俗學者，這個目的可用來說明民俗臺灣刊物的活動，不是這些同仁為滿足自己對臺灣愛好的事情，他們希望讓臺灣有自己的民俗學

63 金關丈夫，〈點心 民俗諦視の新意義〉，《民俗臺灣》3-10，1943年，頁27。

64 《民間傳承》雜誌是1935年所創刊的民俗學專業雜誌，以作為柳田國男主導的民間傳承之會會刊的功能發行流通，是日本民俗學發展上第一本全國規模的刊物，扮演著學術發表、議題交流、知識傳播等功能，對日本民俗學的確定深化具顯著的意義。

者，如此一來記錄研究臺灣民俗將可以系統性朝向建立一學科的民俗學。藉此，本篇幅可透過金關丈夫、池田敏雄、黃連發這三位代表性的人物進行討論。



圖5：1942（昭和17）年，《民俗臺灣》關係者，前排左至右，黃得時、金關丈夫、池田敏雄（站立者），中村哲、（不明）。後排左至右，青木（印刷工廠所長）、國分直一、田宮權助、楊雲萍、立石鐵臣、黃啟木。

資料來源：《民俗臺灣》內容簡介-政大數位典藏<http://da.lib.nccu.edu.tw/ft/?m=2102&wsn=0101>

（一）《民俗臺灣》推進者：金關丈夫

金關丈夫於1897（明治30）年2月18日出生在日本香川縣仲多度郡。1919年，考取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大學畢業後金關留校擔任助手，並於1924年在足立文太郎的介紹推薦下，開始投身於人類學領域的學習，亦跟隨病理學的清野謙次、考古學的濱田耕作兩位教授充實相關學養。金關丈夫開始對民俗產生連結的關鍵點是在1928（昭和3）年，前往東京出席民俗談話會，與民俗學家柳田國男見面，而後開始在琉球、滿州、朝鮮等

地進行體質人類學與考古相關的調查研究，兩年後以《琉球人的人類學研究》取得京都帝國大學醫學博士。1936（昭和11）年，金關丈夫受聘為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並持續對臺灣各民族進行生體計測、人骨及考古調查。調查足跡遍及霧社、埔里、花蓮、阿里山、新竹、高雄、臺南、西螺、鶯歌、淡水、萬華、卑南、圓山及小琉球等全臺各地。⁶⁵

西元1941（昭和16）年，雜誌《民俗臺灣》在金關丈夫擔任編輯發行人，池田敏雄的執行下順利發刊。身為人類學者的金關丈夫透過撰文、演講、蒐集等實際行動，喚起大眾對臺灣民俗及民藝的關注。他以身為學者之姿及與日本學界的往來，為雜誌撰寫書評介紹當時各領域最新著作，介紹的專書包跨了民俗學、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及文學民話等領域。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文獻紹介」專欄中介紹的柳田國男《方言覺書》。⁶⁶這篇是介紹柳田國男進行方言研究的書評，文中提到北海道方言研究對日本國語的貢獻，金關也認為臺灣目前的國語調查對日本國語問題的解決將具貢獻，他舉了臺灣本地語言的例子來說明臺灣民間語言研究的可能性，最後指出他對柳田國男主張的一國民俗學表達充分的尊重，也對此進行詮釋。一方面他對於當時的時局感到困惑，卻仍認為此時有必要將臺灣民俗研究納入東亞民俗學的框架，而這將對臺灣日後民俗學的興盛產生貢獻。⁶⁷除此之外與民俗學發展的相關論著，也可從〈圍著柳田國男的座談〉、〈悼念黃連發君〉、〈奉公運動與臺灣的民俗研究〉等《民俗臺灣》收錄的各篇看出金關丈夫對臺灣民俗學發展的積極與關注。

戰後，金關丈夫留用為臺灣大學教授，並與國分直一繼續在新竹、臺南等地進行考古及人類學調查，1949（民國38）年，結束十三年旅居臺灣的生活返回日本。1954年，柳田國男在企劃的南島文化綜合研究計畫中，

65 林承緯，〈從金關丈夫的民藝書寫看民藝運動對臺灣工藝研究萌芽的影響：以雜誌《民俗臺灣》之〈民藝解說〉為中心〉，《臺灣文獻》，第61卷2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頁4、6。

66 柳田國男，《方言覺書》（東京：創元社，1942年）。

67 近來對於金關丈夫與《民俗臺灣》的討論圍繞著是否以殖民主義及大東亞民俗學為研究意圖的論爭，關於這部分的討論可參閱川村湊、吳密察、三尾裕子等文有詳盡的說明。

委託金關丈夫進行八重山群島的考古學、體質人類學的調查，金關丈夫帶領永井昌文，柳田國男成城研究所的所員酒井卯作，及國分直一進行兩個月的形質人類學、考古學、民族學等各領域的研究調查。⁶⁸根據國分直一的回憶說到：「柳田對於相關科學有所期待，會委託金關丈夫進行八重山的調查，應該是因為金關丈夫是少數進行多方面研究的學者，除了體質人類學，在考古學、民族學、民俗學和古代史學等方面均有極高的造詣。⁶⁹」此次研究最大的發現是，若要了解八重山史前文化系統，必須將南方地區也納入研究視野，有趣的是過程中也拍攝到眾多當地勞動者的影像畫面，這些反而帶給柳田國男意外的感動。柳田認為這些民眾的生活樣貌應該讓昭和天皇了解，因此安排了一次宮中報告的機會，並請金關丈夫與國分直一兩人代表進宮發表。以上篇幅所述柳田國男與金關丈夫的互動，顯示兩人之間存在的密切聯繫，金關丈夫於1928年出席了柳田國男主宰的民俗談話會，開啟人類學者金關丈夫另一扇探索文化之窗，對於民俗學的關心在金關丈夫發行《民俗臺灣》當時，藉由隨筆、書評及策劃民俗研究座談等作法，將柳田國男民俗學加以引介來臺，這對正處於起步的臺灣民俗學建構而言意義非凡。除此之外，在金關回國之後，不僅協助柳田前往八重山群島調查，同時也代表柳田國男赴皇宮向天皇報告南島調查成果，這些歷程都顯示金關丈夫與柳田國男於學問、私交上的密切。

（二）青年實踐者：池田敏雄

池田敏雄生於1916（大正5）年8月6日，島根縣簸川郡莊園村，7歲時入莊園小學校，隔年因隨著父親工作的關係一家渡海來臺，居住在臺北東門街，1929年進入臺北第一師範學校就讀，身為師範生的池田敏雄過著隨性的生活，此時的池田特別喜愛歌人石川啄木的作品，也創刊同人誌《原生林》。師範學校畢業後，進入龍山公學校任教，關於這段過去，身為池田敏雄之妻黃鳳姿的妹婿洪茂榕說到：「他從年輕時候開始就對萬華地區

68 國分直一，《日本民俗文化誌：文化基層與周邊之探索》（臺北：臺大圖書館，2011年），頁239,416。

69 同上註。

發生罕見的、極濃厚的興趣。艋舺青山王公誕辰拜拜的時候，闊步於艋舺街上巨大的七爺八爺留給他及深刻的印象。艋舺住民的日常生活，充實而豐潤的精神生活，以及哀豔動人的民間故事，啟發他對臺灣人的獨特看法。⁷⁰」洪茂榕認為這些原因促使池田敏雄選擇龍山公學校任教。此外，關於池田任教當時的情形，洪茂榕寫下：「（前略）…他開始拋棄一切生活瑣事埋頭苦幹，把所有的精神勁力，集中於萬華的民俗採集及研究，一心一意以民俗學的方法做有系統的研究整理，他利用學生的作文時間，給學生們有關萬華居民的生活與風俗習慣的題目，寫出文章以便做他的研究資料。」⁷¹21歲的池田敏雄已使用民俗學的方法來做有系統的研究整理，池田何時受到民俗學的啟發及影響，讓他埋首於艋舺研究而後又與金關丈夫創辦《民俗臺灣》，我們可從下面這段池田的自述看起。

池田敏雄說道首度認識柳田國男民俗學是在1939年之際，當時閱讀了1938年12月發行的《昔話與文學》，從此對柳田的研究相當著迷，不斷期待閱讀柳田的新作。那時，池田敏雄說道，在閱讀柳田的學習之中，促使我想做臺灣的民俗研究，因此我在臺灣的昔話中找尋跟日本昔話相似的內容，嘗試著用柳田的學說來解釋臺灣的民俗。⁷²讀完《昔話與文學》的池田敏雄捎了一封信給作者柳田國男，不久之後，收到柳田國男寄來的一張明信片與《民俗採訪手冊》，明信片上寫著：「盡可能地使用日本民俗學的用語，將會對日後的交流產生益處。」⁷³1939（昭和14）年，當時已經是民俗學開創者的柳田國男對後進提攜不遺餘力，這段交流帶給默默無聞的青年池田敏雄無比的鼓勵，不僅提供他日後展開艋舺民俗研究的方向，相信內心的鼓舞也是非常大的。柳田國男在1943年由《民俗臺灣》編輯部策劃

70 洪茂榕，〈懷念連襟義兄 池田敏雄先生〉，《臺灣風物》第31卷第2期（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81年），頁8。

71 同上註。

72 池田敏雄著，末成道男編，〈臺灣の民俗と民芸を語る〉，《池田敏雄臺灣民俗著作集》下卷（東京：綠蔭書房，2003年，原作1965年），頁521。

73 池田敏雄著，末成道男編，2003，〈臺灣の民俗と民芸を語る〉，《池田敏雄臺灣民俗著作集》下卷（東京：綠蔭書房，2003年，原作1965年），頁522。

的〈圍著柳田國男的座談〉中也主動提起這段往事，讚許池田對民俗學問追求的熱忱，期待他未來可以成為臺灣民俗研究重要的推手。當年池田敏雄擔任總督府皇民奉公會機關雜誌編輯的工作，根據黃鳳姿回憶：「擔任總督府的工作除了收入之外，也能藉由到各地取材之際，和當地的民俗學研究者面會面。」⁷⁴池田敏雄對於民俗學研究的熱情投入可見一般。

西元1941（昭和16）年與金關丈夫等人創辦《民俗臺灣》，這對池田敏雄投身民俗研究來說是重要的里程碑，這本雜誌可謂池田敏雄對民俗研究想像的具體成果展現，池田費心的編輯策劃，搭配金關丈夫在臺龐大的學術人脈，開啟了臺灣民俗學確立的可能。池田敏雄作為《民俗臺灣》的編輯，在雜誌中以本名或筆名發表了為數不少與魷魚有關的民俗報導文章，其中在第四卷第一號〈臺灣的食習資料〉，出自於1943年七月魷魚採集整理所得，訪談對象是中年本島婦女。這篇文章總共使用了58個項目來紀錄魷魚的飲食文化，主要依據柳田國男所寄來民間傳承之會所編《食習採集手冊》項目所調查而來，⁷⁵調查方式主要是以訪談為主，因此內容中除了紀錄當時的狀況，也同時紀錄下訪談者的回憶。舉例來說，在「第52項自家釀造的酒」項目中，即說明當時已禁止自家釀酒，池田對過去釀酒的狀況也透過訪談得知記錄下來，這是觀察所無法獲取的民俗知識。再者也透過漢字來紀錄臺灣各式的食品名稱，同時使用片假名來標音，另一個特色為在地名詞除了漢字以片假名標音，也透過日文解釋其意。例如「第28項間食」則以此方式記錄：「鹹鴨卵キアムアアヌン（家鴨の卵を長時間醤油で煮込んだもの）」。此文是《民俗臺灣》中的唯一採行《食習採集手冊》為基準所完成的民俗調查報告，不僅如此，池田敏雄在另一篇投稿〈習俗雜記〉中也引用了柳田國男的文章來說明臺灣民俗喪葬供品與日本的相同點。⁷⁶柳田國男對於池田敏雄的影響，除了前述的說明以外，池田敏

74 此段黃鳳姿回憶之言轉引自游珮芸，《日治時期臺灣的兒童文化》（臺北：玉山社，2007年），頁248。

75 民間傳承之會，《食習採集手帖》（東京：民間傳承之會，1941年）。

76 池田敏雄，〈習俗雜記〉《民俗臺灣》3-9，1943年，頁31。在本文中，引用了柳田國男「親の膳」（民間傳承8-1）來說明臺灣民俗喪葬供品的屬性跟日本內地的相同點。

雄的夫人黃鳳姿回憶起池田對民俗調查所說的：「掌握現在民俗真實的原貌，加以記錄進行資料的收集，我們要像柳田國男《日本民俗大系》如此細緻的對於村落進行調查，這將有助於解明臺灣人的文化遺產的全貌。」⁷⁷

（三）民俗學者的發掘：黃連發

黃連發生於1913（大正2）年10月31日高雄州潮州郡，1933年農業學校畢業，同年5月成為東港郡新園庄的技術員，1935年離開東港進入潮州信用購買販賣利用合作社擔任書記。1939年2月退休，之後就進入療養的生活，1944（昭和19）年6月30日因病過世，得年30歲。1943年由《民俗臺灣》編輯部策劃的〈圍著柳田國男的座談〉上，被金關丈夫公開讚許：「黃連發君為《民俗臺灣》近期在臺灣最大的收穫是發掘黃連發君，他在雜誌中發表很多文章。」1942年11月《民俗臺灣》刊載了黃連發首次投稿的作品〈甕神〉，直到過世為止，共投稿了17篇作品於《民俗臺灣》，⁷⁸如：〈臺灣的兒童遊戲〉、〈祭典與行商人〉、〈兒童的習俗〉、〈本島兒童的玩具〉、〈養女與媳婦仔〉、〈農村的粥〉等文。其投稿文章涉略範圍寬廣多樣，除了兒童民俗以外，對祭典、民話、飲食文化、社會制度也抱持著高度的關心。金關丈夫在《民俗臺灣》拜讀到黃連發〈甕神〉一文，其細緻的民俗描寫讓他印象深刻，便利用南下旅行拜訪黃連發。對於這次的旅行，金關丈夫〈悼念黃連發君〉一文寫下：「那一年我到南部旅行，看到黃連發的地址在潮州，便前去找他。我來到潮州經過一個農村，看到一位消瘦的年輕人出現在我面前，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黃連發，當時時間接近傍晚，我到黃連發家中庭裡的竹椅上坐下來跟他聊天。之後我聽到他這幾年都在病床中度過，當時我跟他講什麼已記不太得，不過最後記得的是黃連發希望我寄給他《民俗學入門》這本參考書…」⁷⁹悼念文中金關丈夫也提及黃連發在《民俗臺灣》中的投稿都是養病期間於病床上完成，其對

77 池田鳳姿，〈《民俗臺灣》の時代〉，《民俗臺灣》5卷（臺北：南天書局，1998年複刻本追加）。

78 關於黃連發投稿於《民俗臺灣》的著作，金關丈夫〈悼念黃連發君〉一文中將黃連發的著作目錄清楚記錄。金關丈夫，〈黃連發君を悼む〉，《民俗臺灣》4-8，1944年，頁40。

79 同上註。

於民俗研究的精神令金關欽佩不已，並計劃集結著作出版《臺灣兒童民俗記》，只不過黃連發等不到該書出版即因病辭世。



圖6：金關丈夫〈悼念黃連發君〉一文中的黃連發小照。

資料來源：《民俗臺灣》1944年，4-8，頁40。

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8月東京改造社出版了柳田國男、關敬吾編著的民俗學方法論著《日本民俗學入門》，隔年5月陳紹馨便在「書評專欄」寫下：「臺灣在民俗的研究上還是一個處女地，即使大家努力的進行民俗調查，不過相互都是素人，該抱著什麼樣的問題意識，如何操作，經常令人感到迷惘，在此時，這本《日本民俗學入門》正好是最好的參考…這本書的調查問題當然無法直接適用於臺灣，不過仍不失是一本好的參考書。參考這本書來進行調查可以發現臺灣民俗的特殊性，各地的同好來使用這本書來進行各地的調查，或選擇同樣的議題來進行調查，再將它發表在民俗臺灣上，相信臺灣的民俗研究將蒸蒸日上。」⁸⁰黃連發療養期間仍不停止民

80 陳紹馨，〈書評 日本民俗學入門 柳田國男 關敬吾 著〉，《民俗臺灣》3-3（臺北：東都書籍臺北支店，1943年），頁42。

俗學方法的學習，他退休後在信用合作社擔任書記，沒受過學科訓練的他可以說是一位素人民俗研究者。黃連發看見陳紹馨的書評後，寫信向《民俗臺灣》編輯部借閱《日本民俗入門》這本書。立石鐵臣也在「點心」專欄中寫到這段往事以紀念黃連發：「池田敏雄告訴我高雄的黃連發想要柳田國男的《民俗學入門》，我就把我手上的那本寄給他，比起不是民俗研究家的我來說，像黃連發那樣對民俗有很深的關心，而且對於常在我們雜誌中投稿很多重要文章的人來說，更需要這本書。我聽到這件事很開心，馬上寫封信給他，之後裝滿龍眼的箱子就寄來了……」。⁸¹住在屏東潮州的黃連發經由《民俗臺灣》認識民俗研究，即使病中也不忘藉由書籍學習研究方法更積極投稿，黃連發對民俗的關心及不間斷的稿件，使編輯部同仁夠過文字來認識他。更深層的意義是，我們可以說黃連發是透過《民俗臺灣》閱讀及交流所培養起來的第一位臺灣人的民俗學者，他的民俗採集紀錄特點是充分利用親身經驗，詳實地描繪事物，描述也常常保持著客觀性。⁸²這些多達17則的臺灣民俗採集，主要透過觀察大量書寫兒童民俗文化，提供我們了解當時臺灣兒童生活的珍貴資料。

黃連發的民俗採集作法與當時柳田國男《民間傳承論》一書反覆提起：「採訪收集是民間傳承之學的根本。」⁸³的調查精神一致，黃連發是否讀過《民間傳承論》雖不得而知，但是透過《民俗臺灣》每期稿約明載「本雜誌是在紀錄臺灣本島及相關區域的民俗資料」的說明，以及在創刊號前幾集中也常呼籲同仁投稿形式以民俗資料紀錄為主。對編輯部而言，黃連發應是最貼近柳田國男民俗學精神且貫徹執行的臺灣人，也難怪金關丈夫認定黃連發是他近期最好的人才發掘，進而對他懷抱深厚的寄望之心。「如果他可以恢復健康的話，我們雖然不知道他是否可以如我們的期待一樣擔任民俗學者，不過即使他不想當民俗學者的話，他也是一個非常

81 立石鐵臣，〈點心〉，《民俗臺灣》4-8（臺北：東都書籍臺北支店，1944年），頁12。

82 游珮芸，《日治時期臺灣的兒童文化》（臺北：玉山社，2007年），頁281。

83 柳田國男，《定本 柳田國男集》（東京：筑摩書房，1980年），頁76。

棒的青年。」⁸⁴黃連發是《民俗臺灣》全刊中，是除了池田敏雄之外唯一被金關丈夫稱為「民俗學者」的人物，而非一般所稱的民俗研究家，由此可見金關丈夫除了對黃連發的期待，更多的是對一位尚未完全燃燒民俗熱情的青年的諸多不捨。

肆、圍繞柳田國男的民間傳承談話

（一）對於民俗學的理解

1943（昭和18）年10月17日午後在柳田國男東京的宅邸舉行了〈圍著柳田國男氏的座談會—大東亞民俗學的建設與民俗臺灣的使命〉的座談會，⁸⁵這場座談是以柳田國男為主角所展開的交流談話，其餘的與會座談人是《民俗臺灣》的核心人物：金關丈夫、中村哲、岡田謙、以及柳田國男的學生，亦是雜誌《民間傳承》的編輯者橋浦泰雄（1888—1979）。此次座談會透過與柳田國男的直接對話，除了讓柳田理解臺灣民俗研究的發展現況，金關丈夫等人同時藉由該座談試圖推介臺灣予柳田，期待臺灣也能納入日本民俗學研究的延伸。⁸⁶

到目前為止，我們談到日本民俗學成立的基礎，都會指向柳田國男在1934年出版的《民間傳承論》，以及隔年的《鄉土生活研究法》與《民間傳承》雜誌。柳田國男的民俗學研究從1910年前後開始，到他過世之前共花了五十年自立來推動策劃，在這長達半世紀的進程中，並不是都以同樣的形式作法來發展，五十年間的變化深化了這門學問知識。柳田國男一開

84 金關丈夫，〈黃連發君を悼む〉，頁41。

85 這場談話會的內容也收入《民俗臺灣》中。編輯部，〈座談會 柳田國男氏を囲みて 大東亞民俗學の建設と《民俗臺灣》の使命〉，《民俗臺灣》3-12，1943年，頁2-15。

86 金關丈夫在座談會中說明臺北也期待加入柳田國男古稀紀念的活動，當時的對話見於N.A.，〈柳田國男氏古稀紀念會〉《民俗臺灣》3-11，1943年，頁26。內容如下：「為了紀念日本民俗學創始者柳田國男古稀（昭和19年）之壽，紀念廣大的學恩，全國21位學生發起紀念會，預定舉行的活動如左所示。1.召開日本民俗學地方大會。2.在京城、臺北、新京、北京、張家口舉行民俗學大會。3.發行紀念論文集。（執筆者170位，400頁，約5-6本）。4.在《民間傳承》雜誌上連續刊載特刊號。」

始並不採用「民俗學」來稱呼這門學問，⁸⁷而是以「民間傳承」來替代廣為人知的「folklore」，「傳承」一詞也成了柳田國男民俗學的核心概念，直至1950年代柳田才以「民俗學」來取代民間傳承。柳田國男所說的「民間傳承」，是指除了那些被尊稱為知識份子且也以此自滿的人群，他們保留在生活中帶有古風的東西就是民間傳承。⁸⁸我們也可以說民間傳承研究的核心，就是觀察有識階級之外，或者那些以有識階級自許的人們的生活中，用文字以外的方式保存過去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及思考方式。⁸⁹



圖7：1943，〈座談會 柳田國男氏を囲みて〉《民俗臺灣》3-12期封面。

資料來源：《民俗臺灣》1943年，3-12，封面。

87 在《民間傳承論》出版的1934年間，柳田國男認為日本當前的狀況還沒有達到可以使用民俗學這個名詞的程度，原因是因為當時他認為此學問的內容尚未純化，甚至未達到一定程度的共識，最重要的是柳田認為這門學問還沒有形成自己的體系。

88 柳田國男《民間傳承論》頁11。

89 柳田國男《民間傳承論》頁13。

另一方面，柳田民俗學中採集資料的方法最重視是實地觀察調查得來的資料，文獻僅作為佐證的材料。⁹⁰首重收集足夠的資料並進行精密的比較是民俗學的立場，也因此採訪收集這項學問的根本之道。學問的科學化也是民間傳承之學所重視的，在學術研究方面，建立在精密計畫基礎上的觀察和實踐是具有同等價值的。從「誰都知道」、「理所當然」的背後洞察真理，柳田的民俗學就是要關注常民過去不自知，現在也茫然的部份。⁹¹我們也可知道，民俗學是以探索自我文化源頭，展開廣域民俗文化傳播與傳承脈絡為目標的研究，若要達成柳田期待的一國民俗學，其資料採集者則以沒有語言障礙的的本國人為主。對於資料的分類方法，柳田國男依自然的順序進行分類，第一部分是可視的材料，即生活外型，亦可稱為觀察採集。第二部分是透過聲音採集的語言資料，即生活解說，亦是我們熟知透過訪談的語言知識所獲得的材料。第三部分是通過微妙的心意現象表達才能理解的部分，可稱之為精神世界的採集、同鄉人的採集。⁹²柳田國男透過分類，理解民俗無論到哪裡都是常民大眾的生活中歸納出來的學問，再再強調資料的採集、分類、索引、比較、綜合，是在此基礎上進行的必要工作。⁹³今日的學說可能被明日的採集資料修正，進而又被後天的分類工作再次訂正，柳田認為，一個學問的形成，必定在一開始就要先做好準備。也正如民俗學者福田亞細男（1941—）所說的：「沒有傳世的紀錄資料，就只有到現今殘存的事實中去尋找。對此，需要確立方法，將眾多的痕跡加以比較，從中梳理出變遷之道。」⁹⁴

（二）語言、共同調查課題

誠如上述所提柳田國男從1910（明治43）年前後開始自立推動策劃民俗學研究，柳田民俗學的特點是由一位指導者帶領各路民俗採集研究者

90 柳田國男《民間傳承論》頁50。

91 柳田國男《民間傳承論》頁55。

92 柳田國男《民間傳承論》頁5～6。

93 柳田國男《民間傳承論》頁93。

94 福田亞細男，《日本民俗學方法序說》（東京：弘文館，1984年），頁60。

展開的全國性現地調查，後續再交由指導者柳田國男將資料歸納、整理，並依主題分析闡釋進而建構出日本民俗學。金關丈夫在〈圍著柳田國男氏的座談會〉中率先發言：「我們製作《民俗臺灣》的企圖是希望培育研究臺灣民俗的真正學子，因此投身這項工作。目前參與這份工作的人幾乎都是素人，特別是為了讓雜誌的經營與內容豐富，便加入各種不同混雜的元素，其實這種狀態並非我們所希望，也對於雜誌目前的狀況不感到滿足，希望這本雜誌能盡可能貼近真正的民俗學。目前，池田君立志致力於臺灣的民俗學，並且協助雜誌事務及進行研究，我們期待這樣的人能持續地出現。只不過，我們之中唯一的內行人岡田謙先生已回到這裡（內地）來，導致目前在臺灣沒有適合的指導者。」⁹⁵從中可見金關丈夫對於《民俗臺灣》發刊的明確企圖，即藉由雜誌的推動培育研究臺灣民俗的真正學子。在那當時，僅有熱衷於臺北艋舺地區調查研究的池田敏雄，被金關丈夫認定為真正有意識投身「臺灣民俗學」建構的人物，而前章提及的黃連發，則被金關丈夫稱許為臺灣民俗學者第一人。發起人的金關丈夫雖身為體質人類學者，卻也不敢大意認為自己足以帶領《民俗臺灣》同仁並充分掌握民俗學的意涵，在面對雜誌苦無指導者的情況下，在座談會上一發言就是談到《民俗臺灣》的同仁均為素人，並大膽地邀請柳田國男擔任指導者同時給予臺灣調查研究的新方向，同時也希望臺灣民俗研究可以與日本民俗學接軌開啟暢通的交流。

柳田國男面對金關丈夫在座談會上的積極態度，再以相當的篇幅加以回應，此舉可歸咎於柳田國男對一國民俗學的目標與大東亞民俗學的態度，從座談會上受矚目的「共同語言」，以及所延續的「民俗調查紀錄書寫」兩方面來談。柳田國男在唯一投稿於《民俗臺灣》的文章中更直接指出民俗語彙的重要：「即使像我這種受過教育的人，雖然對臺灣的語言有部分可以理解，不過對於一些用詞的讀解是非常痛苦的，這個就是造成民俗學難以世界共同合作最重要的因素。當然讓相互之間的語言可以互相

95 編輯部，〈座談會 柳田國男氏を囲みて 大東亞民俗學の建設と《民俗臺灣》の使命〉，頁2。

理解這是最直接的方法，不過在此之前，編輯者可以用點心思，將一些難以理解的文字巧妙的排列，讓這些文字可以變得容易理解，這樣是很重要的。（後略）」⁹⁶在1940年代世人面對大東亞統一這項時局命題，柳田認為日本民俗學的發展應對外開始產生對話，並說道擁有共同語言的歐洲已經成立民俗學的國際學會，⁹⁷各國不同民俗的人齊聚進行共同研究，並發展出共同的研究議題。關於語言的隔閡，確實被柳田視為是民俗研究難以跨越區域進行相互合作的問題，阻礙彼此間的連結在於語言，不外乎柳田會提出跨越語言展開合作的大東亞民俗學會。而對於雜誌《民俗臺灣》、《朝鮮民俗》都有出現類似的狀況，因為語言完全不同，看起來好像明白，但若將資料內容連結在一起就令人難以充分理解，單單要把名詞記下來就很辛苦，也因此難以將這些視為自己夥伴間可以合作比較的學問。在此之中，柳田認為臺灣擁有發展大東亞民俗學的最佳條件，除了許多本島人理解日本，臺灣山區擁有不同族群的原住民。因此，去除語言雜亂的障礙，柳田國男提出了以理解實質內容為目標，要「概括式進行共同研究課題」，例如：婚姻的約定及解除。柳田認為民俗共同研究議題的要點是通俗性，限定性的題目會使不同區域研究者難以產生共鳴，民俗學若要成為各民族間共同興趣的事務，《民俗臺灣》更是則無旁貸。在座談會結束半年後，《民俗臺灣》便出現一篇〈國際共同研究課題的提案〉，這是柳田國男古稀紀念會中第一階段對於共同研究課題的提案，包括了三個主要課題：對於異境人的款待、對於祖先的想法、以及結婚道德。⁹⁸

96 柳田國男，〈點心〉《民俗臺灣》5-2（臺北：東都書籍臺北支店，1945年），頁19。

97 柳田國男：「在歐洲其實已成立了民俗學的國際學會，召開了五六次的會議，各國不同民俗的人們齊聚，也進行了共同研究，我們跟那邊的條件相差很多，第一是他們擁有共同語言，特別是東歐的人可同時講德語、法語、英語，雖然國語只有一種，因為語言接近而可以相互溝通，這種現象在大東亞圈內是不存在的。」編輯部，〈座談會 柳田國男氏を囲みて 大東亞民俗學の建設と《民俗臺灣》の使命〉，頁2-15。

98 柳田國男先生古稀紀念會，1944，〈國際共同研究課題の提案〉《民俗臺灣》4-5，頁25。這個紀念會針對內地外的諸民俗學會的聯絡以及民俗學大會的舉行進行準備，在大戰發生的時刻，我們對於大東亞圈內的個民族的團結更感到有必要，希望大家相互的了解各自的民族性，這是很重要的，為此，調查研究的第一個階段選擇了三項共同研究的課題，這個成果希望大家在大會中進行發表以及意見交換，希望大家幫忙，截止的日期之後在公告。三項共同研究課題分別為「對於異境人的款待」、「對於祖先的想法」、「結婚道德」。

這三項共同研究課題揭示了人類共同的行為模式，柳田國男認為在缺乏語言統一的前提下，只要透過行為的比較仍可展開跨國的民俗學對話。如此以議題來進行的民俗採集，在日本國內已行之多年，在柳田國男帶領下的日本民俗學擅長擬定共同研究課題，雖然日本沒有嚴重的語言差異，不過透過調查項目的一致性，將有助於民俗資料採集的科學性並促進民俗學的發展。金關丈夫在〈圍著柳田國男氏的座談會〉中也指出臺灣有需要編輯自己調查手冊的需求，⁹⁹並認為《民俗臺灣》可追隨《民間傳承》中的議題來進行調查討論，¹⁰⁰柳田國男關心的重點則是臺灣有無足夠的民俗研究者可回答共同研究議題的採集問題，指出若能有學校教員或是警察，而本身又是高砂族的民俗研究者，其過程將會充滿各式各樣的文化並令人感到興趣。中村哲接續說道：「日後這樣的事情還真有可能。那邊有皇民奉公會這樣的組織，可透過它的生活部，把民俗調查的問題交付給下屬單位來進行調查回答。」¹⁰¹中村直接說出憑藉政府既有的組織來進行民俗調查，透過大量民俗資料的收集分析，臺灣也能藉此拓展其研究成果。另一方面，金關丈夫也回應到原本有計劃安排推動「民間醫療」的全面調查，可惜因為負責的幹部變動導致計劃取消。由此可看出金關丈夫與中村哲在座談會期間已理解柳田國男民俗學初步的操作模式，並且有共識地跳脫民族主義及政治的氛圍，在為臺灣培養營造民俗研究的環境。然而，臺灣與日本民情不同，因此透過對臺灣的理解下所建構的調查手冊有其必要。對此工作，池田敏雄在1944年曾依照柳田國男的食習調查手帖完成了〈臺灣

99 編輯部，〈座談會 柳田國男氏を囲みて-大東亞民俗學の建設と《民俗臺灣》の使命〉，頁8。

100 為了柳田國男古稀紀念會，《民間傳承》特輯號也在當年度制定了每月共同研究課題，關於金關丈夫在座談會中提及臺灣的共同調查項目也可以依循《民間傳承》所制定的項目進行，其內容為：「民間傳承特輯號，將在本年度一整年每月號訂定共同研究課題，12個題目如左邊所示，這些問題放眼於世界各個民族，特別對於東亞的各民族來說，是把握具有領導地位的我國的民族精神理念、方法、等具體內涵所不可分的問題，今後對於我國所創造的新指標的哲學與科學來說，也具有基礎探究的地位，希望大家對此主旨理解下一起來幫忙調查。一月氏神，二月誕生，三月生死觀，四月鍊成與遊戲，五月生產方式，六月家，七月社交與協力，八月祖靈，九月家庭教育，十月祭典，十一月預覺與前兆，十二月結婚。詳細內容請參考民間傳承。」編輯部，〈點心 柳田國男氏古稀紀念會〉，頁43。

101 編輯部，〈座談會 柳田國男氏を囲みて 大東亞民俗學の建設と《民俗臺灣》の使命〉，頁8。

食習資料臺北市艋舺における【附記】〉一文。¹⁰²同年，《民俗臺灣》編輯部在〈卷頭語〉中向讀者們強調製作調查手冊的企圖及重要性，¹⁰³同時期，中村哲在〈編輯後記〉明確指出調查手冊的項目製作已經在有識之士的討論下有了各種不同的提案。¹⁰⁴雖然金關丈夫也在同期預告下一期雜誌內容將刊登吳尊賢著《來自採訪手帳》一文，¹⁰⁵只不過這篇文稿最終未見刊登，至於「臺灣的調查手冊」也無法如預期般的出版問世。但是藉由上述事證所示，當時以金關丈夫為首，並在座談會中主動向柳田國男提及要製作臺灣版的調查手冊及後續一連串的努力，我們都可視為建構臺灣民俗學的重要歷程。

（三）民俗研究人才培育

「有熱衷於民俗學問的人嗎？我想要培養這樣的人。」¹⁰⁶談到有關臺灣民俗人才的培育，柳田國男在座談會中直接了當的提問。岡田謙隨即答道：「有一個人我想培養，那個人是金關。」¹⁰⁷岡田深知金關丈夫在臺灣聚集了民俗有識之士，非常了解金關在學術及社會上的位置，當時認為一個學科的發展，需要一位強而有力的人來領導，日本民俗學即是以柳田為中心發展成型。座談會中面對民俗學，金關丈夫謙卑地認為自己並無資格可帶領及指導，再三強調希望藉由《民俗臺灣》的影響力培育本島人的民俗學者，而柳田則主動提及他曾接觸過池田敏雄，希望他可以成為一名優秀的民俗學者。以環境培養民俗學人才的方法，柳田接著說道：「不要抱著駁雜的心情想要盡可能收集所有的東西，各自處理自己關心的問題就好。面對其他人的時候，提供對方可以參考的資料的同時，請對方也提供對自己參考有益的事物做交換，我覺得這樣就行了。」¹⁰⁸柳田國男擅長擬定

102 池田敏雄，〈臺灣食習資料-臺北市艋舺における【附記】〉《民俗臺灣》4-1，1944年，頁17。

103 編輯部，〈卷頭語 民俗採集調查項目之作製を企図して〉《民俗臺灣》4-4，1944年，頁1。

104 中村哲，〈編輯後記〉《民俗臺灣》4-5，1944年，頁48。

105 金關丈夫，〈編輯後記〉《民俗臺灣》4-5，1944年，頁48。

106 編輯部，〈座談會 柳田國男氏を囲みて 大東亞民俗學の建設と《民俗臺灣》の使命〉，頁13。

107 編輯部，〈座談會 柳田國男氏を囲みて 大東亞民俗學の建設と《民俗臺灣》の使命〉，頁13。

108 編輯部，〈座談會 柳田國男氏を囲みて 大東亞民俗學の建設と《民俗臺灣》の使命〉，頁12。

議題展開研究，池田敏雄以魴舄為題進行觀察，並嘗試以民俗學的記錄方法將資料科學化，更加深化柳田對他的期待。橋浦泰雄也說道了在新宿成立了西郊民俗談話會，三年間輪讀《鄉土生活研究法》，進展雖不是很順利，後來成員決議各自選擇了最有興趣的題目來進行研究。反而相互激勵產生了共同研究議題，製作出調查表，並以未來可以成為某個領域的權威而努力。¹⁰⁹



圖8：刊登於《民俗臺灣》的柳田國男著作全版廣告。

資料來源：〈廣告〉，《民俗臺灣》，2-10，1942年，最後第二頁廣告。

學問的成立除了有一位導師帶領，還要有培養民俗研究的環境，才能在共同觀點中累積知識進而發展出假說、學問。類似相同概念的民俗談話會雖然在1940年代的臺灣並不顯著，但是《民俗臺灣》編輯部定期策畫探訪各地文化的民俗採訪會，以日本民俗學注重現地調查的態度走訪過士

109 編輯部，〈座談會 柳田國男氏を囲みて 大東亞民俗學の建設と《民俗臺灣》の使命〉，頁13。

林、大龍峒、艋舺、新莊、鶯歌、新竹等地，進行實地考察及同好交流等活動，也可視為啟蒙廣大讀者對於民俗研究的興趣。例如1943（昭和18）年，新莊街的探訪即是富田芳郎以地理學、¹¹⁰黃得時以新莊街歷史及文化發展，為與會的33名同好進行說明，《民俗臺灣》也在探訪會後刊登同仁的探訪手帳、照片記錄及調查感想。¹¹¹又如大龍峒的民俗探訪會結束後，一行人前往大稻埕的山水亭聚會，進行民俗採集方法及觀點的討論，會中也開始有了民俗記錄的共識，就是要跳脫文獻構成的書寫並召開講座傳達適當的研究方法。¹¹²《民俗臺灣》策劃的探訪會也可看出群聚民俗研究者的意圖，藉由學界與素人的相互分享，著實也增添了不少考察紀錄及方法論的討論。雖說柳田國男在座談會中最後大膽說道，民俗人才的養成是希望府縣的師範學校在升格後都能納入民俗學為學科，文理學科除了有民俗學之外，以民俗學為主的研究室也會成立。¹¹³這種以教育著手培養專業人才進行研究，並與其他學科分野，在戰後七十年的今日，仍值得視為提供臺灣民俗學學術發展的努力方向。

伍、結論

戰後七十年後的臺灣，交通網路的建設讓臺灣各地的距離越來越近，一日環島在今日已是輕而易舉之事。也因此，我們必須先確認採行柳田國男「一國民俗學」的視野來看待臺灣是否有意義？筆者以為這點應繼續作為臺灣民俗學這門學科的特色及強項，如此的研究設定亦可做為其他學科參考，並提供想理解社會整體全面的知識。反過來說，如果民俗學放棄了這項研究特質，只是單從調查、研究方法及觀點來與人類學、歷史學、宗

110 臺北帝國大學理學部教授。

111 編輯部，〈民俗探訪の會 新莊街〉，《民俗臺灣》3-6，1943年，頁44-46。

112 中村哲〈民俗探訪の會 臺北市大龍峒 茶話會の話題〉，《民俗臺灣》，2-6，1942年，頁45。

113 編輯部，〈座談會 柳田國男氏を囲みて 大東亞民俗學の建設と《民俗臺灣》の使命〉，頁14。

教學分科區隔，實在不容易充分展現民俗學之所以無可取代之處。臺灣面積不大，比臺灣大上十餘倍的日本列島確實因柳田國男特殊的人格特質及社會地位，才足以完成全日本的民俗資料收集到研究分析。也因此，臺灣更應以全臺為研究視野，雖然漢人與原住民兩大族群體系必須處理的文化差異討論工程不小，不過也因為面積不大而加速跨民族間的文化傳承普遍現象。

又近年來，關於《民俗臺灣》的研究多著墨在刊物的正反評價氛圍，目光多停留在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等議題的討論，少有將注意力放在《民俗臺灣》衍伸出「民俗學」這門學問本身的考察。本論以柳田國男與臺灣民俗研究為題，以雜誌《民俗臺灣》為考察重心，描繪戰前柳田國男在臺灣的人際網絡，及檢視柳田民俗學是否對《民俗臺灣》發刊產生影響受容。在本論中檢視了柳田國男與臺灣原住民接觸的開端、伊能嘉矩的贈書亦成為柳田認識臺灣的窗口之一，特殊的社會身份讓他與臺灣總督安東貞美、民政長官下村宏甚至前任民政長官內田嘉吉友好，到後來影響柳田邁向鄉土研究的新渡戶稻造等，都是提供筆者分析柳田國男旅行臺灣的關鍵要素。文中根據柳田國男訪臺歷程所做的描述分析，提供理解柳田國男1917（大正6）年臺灣旅行全貌完整的過程。在臺灣所見的平地漢人、山中原住民，對正結束雜誌《鄉土研究》的柳田國男來說，雖然尚無法斷言是否對柳田「一國民俗學」學說產生影響，但確實是一道相當即時且理想的研究轉折點。

雜誌《民俗臺灣》為臺灣日治末葉研究留下不少珍貴的傳承資料，而柳田國男的民俗學思想概念也可在此刊中窺見不少。爬梳刊登於《民俗臺灣》中的文章，顯示如：金關丈夫、中村哲、岡田謙這類型的關鍵人物，是為日本與臺灣之間民俗學交流的橋樑。除了對學科的喜好，與柳田國男關係密切的金關丈夫，藉由隨筆、書評、文獻紹介，以及主導在柳田國男東京宅邸的民俗座談會等作法，將柳田民俗學加以引介來臺，再透過雜誌的刊行，促使同仁們開啟對於「民俗學方法論」的討論與相關書籍的閱

讀。尤其是《日本民俗學入門》一書的出版，陳紹馨的投稿書評也表明此書對臺灣的民俗研究有莫大助益，連遠在潮州的黃連發也以此為民俗研究入門的參考書，這對正處於起步的臺灣民俗學建構意義非凡。又如池田敏雄任教期間曾鼓勵學生記錄自家的歲時祭儀、採用《食習採集手冊》為基準所完成的民俗調查報告；又在另一篇投稿〈習俗雜記〉中，引用了柳田國男的論著進行比較民俗的研究，都可謂在柳田國男民俗學方法論底下進行的民俗研究累積。

除了民俗學這門學問的直接引介外，間接與日本內地民俗研究的交流也自成一項主題，以柳田國男為中心的「民間傳承之會」編輯的雜誌《民間傳承》也在《民俗臺灣》中默默地發揮影響力。如〈文獻紹介 雜誌紹介 民間傳承〉中指出《民間傳承》內容刊登各地採集的民俗資料、主張與問題，是了解日本民俗學動向必讀之作。此外〈點心〉一欄也專文說明《民間傳承》中，大藤時彥針對《民俗臺灣》發表的評論：¹¹⁴「臺灣的民俗過去來說，都對高砂族比較感興趣，這個雜誌是以本島人的民俗為重點，這是相當有意義的一件事情，在二月號中看到了童戲、石敢當、蠶神、漬物、國語教育等內容，跟內地的民俗有些相似，忠實的資料採集報告是有意義的，在此，若能針對兩這的內容進行比較研究，應該會有很多發現。」¹¹⁵又如三省堂的民俗學專書出版也在《民俗臺灣》中可見全版廣告，譬如第一本《桃太郎 誕生》便使用「民俗學權威柳田國男初期力作」為書籍宣傳口號；第二本《盤城昔話集》是以柳田指導下的收集為宣傳，廣告中指出本書是具世界級水準日本民族學研究方法的重要資料。在這些廣告中，強調柳田為民俗學權威、世界級水準的研究方法重要資料等，是《民俗臺灣》讀者認識柳田國男的另一個媒介。

114 大藤時彥（おおとう ときひこ、1902-1990）日本民俗學者，師事柳田國男，參與日本民俗學會的成立並為代表。曾任為成城大學教授，1973年為成城大學名譽教授。著有《民俗學覺書》、《柳田國男入門》（筑摩書房，1973年、《日本民俗學的研究》（學生社，1979年、《日本民俗學史話》（三一書房，1990年）。參閱「日文維基百科」：<https://ja.wikipedia.org/wiki/大藤時彥>（2017/1/7查閱）

115 編輯部，〈點心〉，《民俗臺灣》3-10（臺北：東都書籍臺北支店，1943），頁26。

整體而言，《民俗臺灣》不僅累積可觀的臺灣民俗文化採集成果，成為研討臺灣尤其是漢人民俗文化議題的園地，也因為金關丈夫、中村哲、國分直一等人與日本國內民俗學界的往來連結，《民俗臺灣》亦可視為日本民俗學、民藝運動等學問傳入臺灣的重要媒介。《民俗臺灣》將民俗研究當作一門學問討論並試圖釐清與相近學科的關係，營造研究的氣氛培養民俗學者，對於「民俗的理解」、「民俗紀錄書寫的原則」有大量的討論，也介紹方法學入門書籍，但徵稿內容卻也不侷限於民俗學的記錄，廣納各界多方投稿。儘管現今民俗學在臺灣存在與否仍充滿不同論調之說，「民俗學」一詞也被無理濫用，臺灣一直沒有缺乏民俗研究的議題，學科至今卻無法真正建立。然而藉由梳理這段民俗研究過往的足跡，完整的民俗意識已儼然傳入臺灣，即使在大東亞民俗學下的討論也可見，我們卻也無法否定日治時期《民俗臺灣》試圖建構臺灣民俗學的意圖，在這之前臺灣沒有所謂的「民俗學討論」，參與《民俗臺灣》編輯同仁多數為在臺日人或灣生，都是為了紀錄、保存臺灣的民俗，多懷抱著善意來看待臺灣島上的一切。過程雖因國家的政策與各自觀點的相異而產生論爭，其核心基礎仍是珍視臺灣的民俗記錄。在戰後七十年的今日，臺灣民俗研究仍被視為學科的邊緣，展現在我們眼前的，並非是這近百年更加成熟的學問，在豐富多元的文化下，解析後暴露出來的是其今日學問深度不足的困境。至於延續日本《文化財保護法》框架的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法》，究其無形文化資產的部分，亦可清楚看出柳田國男民俗學留下的身影。

參考文獻

一、專書

- 小林保祥，《高砂族パイワンの民藝》。東京：三國書房，1944年。
- 川村湊，《「大東亞民俗學」の虚実》。東京：講談社，1996年。
- 池田真奈，〈「殖民地下臺灣の民俗雜誌」解題〉，《民俗臺灣》5卷。臺北：南天書局，1998年復刻本，原作1982年。
- 池田敏雄，〈柳宗悅と柳田國男の『不親切』〉，《池田敏雄臺灣民俗著作集》下卷。東京：綠蔭書房。末成道男編，2003年復刻本，原作1980年。
- 池田敏雄，〈植民地下臺灣の民俗雜誌〉，《臺灣近現代史研究・池田敏雄氏追悼記念特集》。東京：臺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綠蔭書房，1982年。
- 池田敏雄，〈臺灣の民俗と民藝を語る〉，《池田敏雄臺灣民俗著作集》下卷。東京：綠蔭書房。末成道男編，2003年復刻本，原作1965年。
- 池田鳳姿，〈《民俗臺灣》の時代〉，《民俗臺灣》5卷。臺北：南天書局，1998年復刻本，原作1982年。
- 吳密察，〈《民俗臺灣》發刊的時代背景及其性質〉，收錄於吳密察編，《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臺灣：新自然主義，2009年。
- 吳密察，〈『民俗臺灣』発刊の時代背景とその性質〉，收錄於藤井省三・黃英哲・垂水千恵編，《臺灣の「大東亞戦争」——文學・メディア・文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 柳田國男 著，王曉葵、王京、何彬譯，《民間傳承論與鄉土生活研究法》。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年。

- 柳田國男，《定本 柳田國男集》第1卷-第31卷+別卷第1-別卷第5。東京：筑摩書房，1962-1980年。
- 柳田國男、關敬吾著，《日本民俗學入門》。東京，改造社，1942年。
- 國分直一著，李作婷、邱鴻霖譯，《日本民俗文化誌：文化基層與周邊之探索》。臺北：臺大圖書館，2011年。
- 陳豔紅，《「民俗臺灣」と日本人》。臺北：致用出版社，2006年。
- 陳偉智，《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2014年。
- 游珮芸，《日治時期臺灣的兒童文化》。臺北：玉山社，2007年。
- 緒方武歲編《臺灣大年表》。臺北：南天書局，1994年複刻本，原本1938年。
- 福田亞細男（福田アジオ），《日本民俗學方法序說》。東京：弘文館，1984年。

二、期刊論文

- 三尾裕子，〈以殖民統治下地「灰色地帶」做為異質化之談論的可能性——以《民俗臺灣》為例〉，《臺灣文獻》，第55卷3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4年）。
- 末次保、金關丈夫編，《民俗臺灣：風俗・習慣の研究と紹介》1卷1號-5卷1號（臺北：東都書籍臺北支店，1941-1945年）。
- 林承緯，〈從金關丈夫的民藝書寫看民藝運動對臺灣工藝研究萌芽的影響：以雜誌《民俗臺灣》之〈民藝解說〉為中心〉，《臺灣文獻》，第61卷2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年）。
- 林承緯，〈臺灣民俗研究的發展歷程及展望：邁向臺灣民俗學之路〉，「臺灣民俗研究青年學者學術研討會」（臺中：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2014年）。
- 邱淑珍，〈柳田國男と臺灣民俗学〉，《国文学 解釈と鑑賞》，第72卷12

號（東京：至文堂，2007年）。

洪茂榕，〈懷念連襟義兄 池田敏雄先生〉，《臺灣風物》第31卷2期（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81年）。

國分直一，〈『民俗臺灣』の運動はなんであったか——川村湊氏の所見をめぐって——〉，《しにか》812號（東京：大修館書店，1997年）。

國分直一，〈中村哲先生と『民俗臺灣』の運動〉，《沖繩文化研究》16號（東京：法政大學，1990年）。

植野弘子，〈『民俗臺灣』にみる日本と臺灣の民俗研究——調査方法の検討を通じて——〉，《東洋大學社會學部紀要》，第50卷1號（東京：東洋大學社會學部，2012年）。

新谷尚紀著，林承緯譯，〈日本民俗學對臺灣民俗研究的可能助益〉，「2011文化源經典講座暨研究生學術研討會」（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資源學院，2011年）。

戴文鋒〈日治晚期的民俗議題與臺灣民俗學——以《民俗臺灣》為分析場域〉。嘉義：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年。

三、報紙

《臺灣日日新報》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A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Yanagita Kunio on Taiwanese
folklore-studies: the case of *Minzoku Taiwan*

Ting-I Wang*

Abstract

Ever since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Taiwanese folklore studies have always been categorized as a part of other fields such as anthropology, literature, history, etc. Academia has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why folklore studies have not been able to become its own specialized subject. This article is a study on this issue, focusing on the studies of Yanagita Kunio, who has visited Taiwan before the war and also known as the father of Japanese folkloristics, and using "*Minzoku Taiwan*" as an example, to ponder the possibility of forming a Taiwanese folkloristics. First, we analyze Yanagita Kunio's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travels in Taiwan from first-h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specialized research and pre-war news articles. Then, we investigate how the Taiwanese folkloristics was influenced by Yanagita Kunio's folklore methodology. Finally, we take a deep look at how the concept of Yanagita's folkloristics was solidified in Taiwan through the editing of "*Minzoku Taiwan*". The magazine *Minzoku Taiwan* started a channel for discussions on the Han people's folklore studies, and gradually formed the basic criteria of the Taiwanese folkloristics. Taiwanese folklore studies began to develop during the Pacific War. The main foundation of the blooming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folklore studies was a huge network of academics of Professor Kanaseki Takeo at the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the exchanges between Kanaseki and the Japanese folkloristics academia, and the active

* Master of Art, Majoring 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he Arts

participation of amateur folklore studies researchers. *Minzoku Taiwan*'s numerous articles which discuss folkloristics' methodology, disciplinary viewpoints, etc. was a direct reflection of the initial steps taken to form folkloristics into a specialized subject. The discussions on "folkloristics" methodology, disciplinary viewpoints, etc. gradually increased in the many articles of "*Minzoku Taiwan*". This article uses Yanagita Kunio's folkloristics methodology, which was already maturely developed at the time, as its backbone, to comb through Yanagita's influence step-by-step.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influence of Yanagita Kunio's methodology on the publication and editing of *Minzoku Taiwan* is summarized from topics including: "the influence of editing on the comprehension of folklore studies", "principles of folklore records in writing", "introduction and review articles on Yanagita Kunio's publications", "full page advertisement on Yanagita Kunio's publications", "senior talks", vast amounts of "introductions to the contents of the magazine "*Minkan Densho*", "citations of Yanagita's articles", "actual methodology applications by colleagues of *Minzoku Taiwan*, and "Yanagita's submissions to *Minzoku Taiwan*, etc. It was discovered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editing and the contributed content, that even under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the Japanese rule, Taiwan still had the opportunity to form its own Taiwanese folkloristics at the time.

Keywords: Yanagita Kunio, , folkloristics , *Minzoku Taiwan* , Kanaseki Takeo , Japanese period